

史 地 小叢 書

中 央 亞 細 亞 的 文 化

羽 田 亨 著

張 宏 英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譯

羽田亨著
張宏英譯

小史
叢書 地

中央亞細亞的文化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三〇〇一四)

I五三二平

古今地圖叢書 中央亞細亞的文化一冊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張羽
譯述者 田宏

王長沙南正路
雲英亨

發行人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王雲英

發行所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王長沙南正路
雲英亨

(本書校對者王崑武)

***** 版權所有必究 *****

譯者序

本書是從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岩波講座東洋思潮中的一冊翻譯出來的。

著者羽田草博士，是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科的教授，只要研究東洋史的人，尤其是專攻西城或中亞史的人，我想是沒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他的舊著西城文明史概論（曾在商務出版）爲斯學開了一個新紀元，是毫無疑義而可以承認的事實。

本書是依據最新的資料，比前書更廣範地將中亞作一個通史的敘述，所以本書雖是一本小冊子，但儘可說是一本壓縮了的中亞通史。前半敍述從古代到帖木兒帝國時代止的中亞的史實之大勢，後半說明其種種的文化事象，將博士過去二十餘年之間研究的精粹，盡集於此！

通史的著述，誰也知道是難的，尤其是像中亞，內部的地理，文化，人種各有不同，在此政治上建立大勢力的，只有帖木兒帝國，他的大部分的歷史，是其四周的强大勢力支配的歷史，可以作爲東西文化交流的舞台底中亞的通史，不容易著筆，是不用說的。這本小冊子，簡潔地概觀複雜之極的中亞往古的樣相，我想是很便利地可以給我們以一個中亞史的概念的。因此譯者便不惴淺陋，遂譯之，以介紹於我國的讀者。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譯者序於日本廣陵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中亞的民族	二二
第三章 中亞史的曙光	一八
第四章 亞歷山大的東方經略與大夏及安息	二三
第五章 民族之移動	二八
第六章 漢之西域經營	三〇
第七章 貴霜王國	三四
第八章 嘺噠突厥的活動	三六
第九章 唐之西域經營與回教勢力之東漸	三九
第十章 回鶻之西遷	四二
第十一章 蒙古之中亞經略與其以後	四四
第十二章 中亞與希臘文明	四八
第十三章 翠利人與商業	五四
第十四章 翠利語及天山南路使用的諸語	五九

第十五章 中亞的諸宗教與其典籍.....	六五
第十六章 宗教美術.....	七六
第十七章 中亞與漢文明.....	八三
第十八章 回鶻的西遷與西域文明.....	九〇
第十九章 突厥族與回教.....	九八
第二十章 帖木兒王朝與突厥文明.....	一〇四

中央亞細亞的文化

第一章 緒論

中亞這個地域，在學術上不一定有一定的範圍，他所指的地方，因學者而有廣狹之差。現在我用這個名稱，來稱呼：大體當於亞洲大陸的中央一部，廣括不通外海的河水所流過的諸地方。因而被這個名稱所包括的地域，大略以葱嶺(Pamir)高原為中心，東是注入羅布泊(Lop-nor)的塔里木(Tarim)河流域地方，——中國新疆省天山南路地方；北是流入熱海(Issik Kul)的巴爾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庫爾(Ala Kul)等河的流域地方，——包含伊犁，準噶爾等處的天山北路地方；西是注入鹹海及裏海的流域地方——俄屬突厥斯單地方；南是以崑崙山脈，興都庫什(Hindkoush)山脈為界限的地方。德國地理學者利希陀芬(Richtofen)將這個名稱，用來稱呼：曾經積水成瀦，而流水不通的亞洲大陸的盆地地方，因而這個地域，大體是包含：南從西藏高原，北到阿爾泰地方，西從帕米爾的分水嶺，東到黃河的分水嶺及興安嶺山脈之間的地域，注入帕米爾西方的鹹海、裏海的流域地方，與其餘的地方一起，被括入他的周圍區域這個名稱之中；但是我站在歷史研究的立場上，將這周圍區域的一部，也包含於其中。此外中國古來就有西域這句話，有時是指葱嶺以東的所謂天山南路那個地方，有時又廣義地用來汎稱位於

中國西方的地方；在此所謂中亞，限於比前者廣，比後者狹的地域。——這是非豫先注意不可的。

然而，這個地方，也可以以爲是：東被中國本部，蒙古，西被波斯，南被印度，西藏等國所包圍，位於亞洲諸大勢力的中央，而自成一區域的；但是若果稍爲深查各種的事情，則可以知道：這個地方，不一定形成合合式式的齊一的區域，從地理，人種，文化各方面來講，至少可以大別爲三個地方吧！即是第一天山南路地方，第二葱嶺之西，錫爾(Syr)阿母(Am)兩河之間的地方，第三是包含天山北路地方與俄屬七河省(Semiujechensk)的地方。這些地方，各以大山脈大河流，來範圍相互之間，在那裏居住的人種，也因時代而各異，因而他的文化也有顯著的不同。從這樣的事情考察起來，則這幾個區域，應該各個作爲個別的存在來處置，將這些作爲一體，而討究其間的歷史發展的痕迹，好像是無理似的。但是又從他一方面考察起來，則這些地域，古來就是政治關係，非常密切的，有時是其大部分或其全部，統一在一個勢力之下，不然，則爲互相的存立之故，舉行攻略與協約，山河自然的障壁，也不能阻止這種密接的關係。因而本來的人種與文化的不同，也自然發生混合與融合，同時有如以後「突厥斯單」這個名稱所表示的一樣，包含這些地域的全部而突厥人都成爲主要的住民；突厥族之中，除去另外西入波斯，占據小亞細亞，更侵入歐洲的一部分以外，欲考察其餘的突厥族的歷史之時，自然，非將住於這個地域的全體人民，作爲一個整體來觀察不可。若果是這樣，則這些地方的相

互之間，雖有種種不同的事情，但是將此集攏於中亞這一個區域之內，而研究其文化發展的歷史，不單沒有一些兒的不合理，同時還大有理由，而不是單將這些地域，放在漠然的地理的概念之下，——只說其是位於中國與波斯，印度等々大國的中央底地理概念之下，而可以處置的問題。

更非注意不可的事實，是這種研究，除去當面的目的以外，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是：這不獨關係到中亞的地方而且在其隣接諸國的歷史研究上，俱有極其重要的關係，尋求這些國家相互之間的政治文化的交涉痕跡之時，若果忽略了這種研究，則雖說幾乎不能達到他的目的，也非過言。蓋中亞這個地方，如前所述，是被中國，波斯與印度等國，或突厥，蒙古與西藏等等慄悍民族占據的土地所包圍，而位於這個中央的那個自體，有如翻開地圖，便可以容易知道的一樣，決沒有好的自然條件，可以出現強盛的國家，古來就沒有以這個地方為根據，勃興大勢力的例子。僅紀元十四世紀之末，出了一位英傑帖木兒，一時發揮其強大的勢力；但是這是史上的異例，不過當時亞洲諸國的情勢，暫時允許這位不出世的英雄活躍而已。所以這個地方，幾乎常受這些周圍勢力的侵略，是四方爭奪的目的地。但是雖然單說中亞也如前所述，事情各有不同，所以也有不能一概同樣敘述的事情，就成為侵略目的地之中，其間也有由於各別的性質之點。例如中國古來常常攻略狹義所說的西域地方，都像當時的經世家所論的一樣是為着強固此地，以避免北方民族的勢力直接及於中國本土之故；反之，從北方民族的立場

來講，則除去經略此地，徵求貢物的目的以外，更是爲着想得到衝進中國本土的便宜之故。然而俄屬突厥斯單在其富厚方面，顯然優於前者，因而雖成爲攻略的目的地，但其理由與前者也稍有不同。可是，雖說是這個地方，但從其西方的波斯對東北遊牧民族的立場，或從這些遊牧民族對波斯的立場來考察之時，則依然與前者的場合一樣，事實上，幾度在這種事情之下，兩者之間反復爭奪此地。如是中亞這個地方，跟着其周圍的國家民族的勢力之盛衰，雖有程度之差，但是在其各個的支配之下，幾乎是其不可避免的運命。這種狀態，從歷史上的大勢來看，意義是極其深遠的，若果這個地域，不位於這些勢力之間，則這些大勢力，一定直接反復衝突了好幾回。縱令這些大勢力之中的某種勢力，支配了這個地域的一部，或其全部，而其結果，成爲相互接觸之時，其勢顯然多已柔和，成爲餘波的情形而表現出來了，可以承認出：其間，與兩者直接的場合，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觀之，不過是弱小勢力所占據的地方而已底，中亞這個地域，完全是這些大勢力的緩衝地帶，我們以爲因此四圍的國家，民族，才可以各自保持其獨自的位置，展開今日我們知道似的東洋史上的局面。從他一方面；我們也以爲：亞洲各個互相遠隔的强大國家，也是由這些地方而得到連絡，相互之間，造出不可分離的關係。

中亞與其周圍諸國的密切的關係，不獨在政治上極其顯著，就在文化的歷史上，也有極其顯著的東西。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西方的波斯，阿拉伯，希臘，羅馬等等，各方文明交流傳播的情形，也是歷史上最有興味的事實，又是重要的事件；但是，這種文明的交流傳播，

不用說，是以相互之間，有直接間接的交通的存在，爲其前提的。可是東西的交通，在海上交通發達以前的時代，不用說，就在其以後，依賴陸路的交通，最重要的，也是經過所謂中亞的那條道路，不單是從波斯，阿拉伯，歐洲各國到中國方面，就從南方的印度到中國方面，最普通的道路，也是先北上而入中亞再折而東行的。在蒙古地方與西方的交通關係（這種關係，無疑的，是中國與西方開始交通的前後開通了的）之中，一定也是經過這個區域之一部。若果是這樣，則這個地方，在東西交通史上，或在東西文明傳播史上，其歷史具有深長的意義是更無須再說的必要了。但是在此須要特別注意的，是下述的事實：——關於這一點，從來承認中亞史的意義的人，也只注意到：東西交通，單單是通過這個地方，東西文明，經過這個地方而互相傳播底事實，進而關於這些交通怎樣地在此處舉行，如何發達了底兩點，却沒有下以大的注意。這樣的態度，當然是因爲從來中亞史的研究，不精密之故，導引出來的結果，不得不說是非常粗笨的意見。爲什麼呢？因爲大凡文明傳播的現象，在利用往昔情態中的陸路交通，來傳播的場合，從甲地及於乙地之時，跳過介於兩者中間的地方——像這樣的事實，應該認做是極其特殊的，普通都是以漸次波及互相隣接之地爲原則。這一點，若果與下述的事實——海路交通，以特殊之地爲目的，其間不過經過僅少的寄港地而已底事實相比較，則不可不知道：在文明傳播的事情中，大不相同。以現在記述傳留下來的交通關係底記錄，爲依據來考察之時，則交通最多的，從西來的，是以中國爲目的地，從東來的，是以印度，波斯，羅馬等等遠隔之地

爲目的地，所以一講起交通，馬上就容易將注意只弄到這種遠征的事情上面去，其實像這樣的事件，因爲是非常之特殊的，所以特別記述下來的而已，不能記述下來的，不能傳說下來的最普通的交通關係，一定是相隣接之地，相互之間，逐次交通，終於達到遠隔之地的間接交通。因而文明的傳播，乃基因於這種間接交通是非作爲最普通的事情不可。例如西方諸宗教的東傳過程中，當其傳到中國以前，若果非先經過當路的中亞地方，富於宗教的熱情與思索底伊蘭人種所住的地方不可的話，則這些宗教，先傳到此地，更由此地傳播而及於中國底這種見解，在解釋上，非認爲當然的方針不可。這種見解，如下所述，依據今日種種的史料，可以證明其沒有錯誤。只知道：其間偶因特殊的事情，特別將那從其本地，向中國傳道的東西，作爲特殊的事實，而載在史乘上，便以爲這是此時才從其本地傳來的，很少顧慮到在中間地帶，關於這些的消息，則不可不說是錯誤非常。藝術，學術的傳播過程中，也是一樣。要之，在東西各種文明相互的傳播上，此地的文明，成爲他的連鎖，他的關係，相當於前述政治方面對於周圍諸國的位置，而成爲他的連鎖之時，因爲各方的文明互相混淆，或因此地的民族，加以自己的勞動之故，而發生多少的變化，是不用說的，其中，因此而出現與其本來的姿態非常不同的東西，而且那些也有更依據其本來的名稱，而更行傳之於東西的。這個場合，若果不研究當於這個連鎖的這個地方的文明，而馬上比較研究位於其兩端的文明，則到底不能得到正鵠，是無須論的。因而不可不知道：這個地方的文化之歷史的研究，一方面在其自身具有深刻的意義，同時

在其周圍諸國的文化史的研究上，也具有極其重大的任務。

以上，規定了這一篇中所謂中亞的語義，辨明中亞史可以成立的緣故，而略說其在廣義的東洋歷史上，具有的意義。以下所論述的，自然是將其中心，放在這個地域之中；然而歷史上複雜的現象，他的範圍，常常不能與地理上的區域相同。何況中亞史的意義之一半，如上所述，在於與其周圍諸國的關係中之時則更是如此。因而有的記述，述到中國本部，或是關於波斯及蒙古，這，在我的立場上講起來，以爲毋寧是當然的，不是沒有顧到徒然流於散漫之處。

在此，更想附記的，是本篇題爲中亞的文化；但是若果想論述其文化發達的足跡，而不先敘述興亡盛衰的變轉極多，而且普通甚少爲人知道的這個地方的民族，與勢力的推移狀態，則千言萬語的敘述，也終會歸於無益底事情，乃昭然若揭。所以不關於書名如何，在起初的部分，先在可能的範圍內，簡單地敘述一般的史實，以後才論述他的文化。這些敘述，若果不會成爲無益的贅言，則幸矣。

第二章 中亞的民族

現在占據中亞的民族，有如從突厥斯單，即是從突厥人的國家的名稱，可以知道的一樣，突厥族，是其主要的民族，乃不用說的，但是古時，却不一定就是這樣。試就前章敘述的中亞的三區域而考察之，則從天山北路到俄屬七河省的地方，無疑的，似乎從記錄時代之初起，就是突厥族的根據地，也未可知，雖說是這樣，但也決非可以容易斷定的。在中國前漢時代到南北朝時代，即是從紀元前二世紀到紀元後五世紀的記錄中，可以看見：現在的伊犁，天山北路的谷間地方，叫做烏孫的部族蟠據着，與中國有了密切的關係。若果考察這個部族所用的言語，傳留到現在的，則我以為是屬於突厥語；唐代的顏師古，關於烏孫的容貌，有如下的記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獮猴者，本其種也。」（漢書西域傳烏孫條註）依此則不能一概斷定他們是突厥種。這是因為師古所說的胡人，是當時的名稱，稱呼伊蘭人種——以現在的撒馬爾罕地方為中心的，翠利（Zardjir）地方的人，——的，他那青眼赤鬚，狀類獮猴，正可以描寫這種人的風貌，不是指突厥人的緣故。但是顏師古以前敘述這樣的主張的，現在沒有遺傳下來，所以會有人以為：這不過單是顏師古一片的想像而已，也未可知；可是這樣的類例，此外還有，是不能這樣簡單地決定的。例如現在作為突厥族的一種，而為人所周知的黠戛斯（Kirghis）部族便是，這個部族，從漢代起，也是以堅昆，鬲昆的

文字，來記其名稱，降至南北朝時代，則記作契骨，居勿，結骨，唐代則記作紇扢斯，黠戛斯，等等，他的言語，最少在唐代，已經明白地使用突厥語，可是關於他的容貌，則唐書回鶻傳下，黠戛斯傳，記着：「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這決不是突厥人的容貌，也是伊蘭人種類的特徵。突厥族一般都有以狼爲族祖的傳說；唐朝段成式撰的酉陽雜俎卷四之中，記着「堅昆部落非狼種」的語句，說黠戛斯部族非突厥種。依據這些記事，則以葉尼塞河 (Yenenei. R.) 上流地方爲根據地，而講純粹突厥語的唐代的黠戛斯部族，實在也不是本來的突厥族，是一種雅利安 (Aryan) 種族，他們突厥化的程度，非看做：跟着時代的下降而逐漸加強，終於成爲現在的情形不可。關於烏孫，顏師古的記事，不是簡單的臆說，有什麼根據，也未可知。西洋的學者之中，也有人將此當於古代記錄中的雅利安種的遊牧民——阿息 (Assi) 族的。但是烏孫，如下所述，乃前漢文帝時代，驅逐了從現在中國甘肅省內，逃到此地的大月氏，這個部族，而占據此處的，大月氏，更驅逐其前任者的塞種 (Scythian) 部族而代之。而塞種與大月氏，在現在普通的學說，可以認做是屬於雅利安種的。總之，我們不可不承認：大月氏，在記錄時代，當初的人種分布上，是作爲雅利安種向東方進出的先鋒，而侵入到甘肅省的。

俄屬七河省的南邊一帶，從漢代起，就住有康居這個部族，其勢力也及到寧夏地方；這一部族，從其生活狀態與言語上來講，我以爲是屬於突厥種的。關於這一部族，沒有傳述出像烏

孫，黠戛斯的容貌上的特徵，認此爲突厥族，也沒有從記錄上發生的不妥當。但是，雖然一概說是突厥族，但其和今日的突厥族，真的是同一與否，則非大大地注意不可。雖然知道其言語，風俗，生活情態等等是同樣的或是近似的，但是人種自身，却完全是另一種也未可知，從前面黠戛斯部族的場合來講，也是可以想得到的事實。若果時代愈降，則人種混淆的程度愈高，純粹的民族型之消滅是常態的話，則以今日關於世界人種的知識，精密地來類別古代的民族，實在也不可不說是不合理的方法。可是現在關於這一點，是不應該深論的。康居從何時起，就佔據了這個地方呢？這也沒有判明。本來，這一方面，是雅利安系的種族，侵入到康居部族住的地方呢？反之，還是突厥系的種族如康居，侵入到雅利安系種族蟠據的地方呢？——這些事情，是屬於史前的事實，現在是很難確實地判定的。總之，當這個地方具有記錄時代的初頃之際，從天山北路到俄屬七河省地方，所住的遊牧種族，我以為是屬於雅利安系與突厥系的；但是漸次因爲形勢的變化，於前漢的武帝時代，大概是紀元前一三〇年代，便看見大月氏向西南方的移動，代此而起的，是屬於突厥語族的烏孫佔據着，直到中國的南北朝時代。無疑的，純粹的突厥種族，佔據此地，是其以後的事實。

其次，關於天山南路地方的民族，則依據後面敘述的，由這個地方的發掘，而得到的言語，繪畫，骨骼，頭蓋等等各種資料的研究，而無疑地知道：雅利安系的民族，最遲於紀元的前後，已經居住於這個地方了。

關於最後的錫爾，阿母兩河間的地方，在其中央擁有有名的翠利的沃地底地方的住民，則在此稍有深加論述的必要。無須再說，這個地方的某一地域，是雅利安種族的原住地，這種意見，在前世紀的中葉，是風靡學界的學說，現在也尙爲一部分人所繼承。這種意見，是什麼時候起，用什麼理由，是誰唱導的呢？在此雖然簡單，但也非知道其過程不可。

●這種學說的發生，是由於歐洲比較言語學的發達，而使這門新科學——比較言語學成立的，是基因於十八世紀的末葉，歐洲學者盛行研究梵語（印度的古語），與增得（Zend）語（波斯的古語）之故。研究這些古代語的結果，發見了這些古代語與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克勒特語（Celts）等等之間，存有多數的類似點。一七八六年，準茲（William Jones）說明這種現象，以爲這樣的類似，只有站在一種假定，——這些言語，是出於同一系統的假定之上，才可以解釋的；這種論斷，實在爲這種學問，放下了不動的基石，非說是使當時的學界覺醒的警鐘不可。其後，一八三三年以來，德國的言語學者波普（Franz Bopp），比較研究梵語，增得語，希臘語，列脫語，峨特語，古代斯拉夫語，日耳曼語等的文法，繼續公刊其有名得比較文典，在此便使比較言語學這一門科學成立了。因這樣的研究，而知道：歐洲的現存語，除去巴斯克（Basque），芬（Finn），馬札兒（Magyar），突厥諸語之外，是屬於同一語系的，是亞洲的現在語，與下列諸語——屬於梵語系統的印度諸語，屬於增得系統的伊蘭諸語，（伊蘭與雅利安是同一語言，是稱呼波斯方面的雅利安民族之時，所使用的形式）及阿美尼亞（Armenia）

語等等，有密接的關係，非包括在所謂印度日耳曼（Indogerman）語族的名稱之下不可。跟着歐洲學者研究梵語及比較言語學的進步發達，當然會發生出來的思想是：一，現在使用範圍很廣大的，屬於同一種的言語之中，必定有其本源的母語，這個母語是那一個呢？二，若果有本源的母語，則發生作如下想像的傾向，——使用這些言語的人們，都是從同一的祖先繁衍出來的吧！換言之，從言語上來探究他的根源，同時也涉及人種問題。終而至於使之發生出，同一語族便是同一民族的觀點。這種傾向，老早就在從事言語學問的人們之間，表現出來了，印度日耳曼語最古的形式，是梵語及僧得語。——以這一點為根據，來論述亞細亞，尤其是中亞，是使這種言語發達的民族之搖籃地底學者，陸續出現了。例如有名的坡特（Pott）便是，他說：藥殺水（Yaxates）媯水（Oxus）——錫爾，阿母二大河流所灌溉的喜馬拉雅（Himalaya）之北，裏海之東的地方，便是這個民族的發祥地，很多有權威的學者也支持這種見解。而且這種學說，至前世紀最有名的一位梵語學者繆勒（Max Müller）而有所大成，似乎被認為當時的學界的定說。繆勒將坡特等人稱呼印度日耳曼語，法蘭西，英吉利的學者稱呼印度歐羅巴語的名稱，單呼為雅利安語；將普通稱呼印度伊蘭語之時，所使用的名稱，來總稱廣布印度，歐羅巴的同一系統的言語；一八六一年，就這種意義上的雅利安民族而立論，說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斯拉夫人，克勒特人，日耳曼人等等的祖先，曾經有一個時期，住在同一的屋頂之下；又說：若果從下述的事實——言語上的同一形，為一切雅利安民族所保存的事實，考

察起來，則印度人，波斯人的祖先，進住於南方，希臘人，羅馬人，克勒特人，條頓人，斯拉夫人等等的殖民統率者，進住於歐洲海岸以前，雅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住在中亞的最高地，所講的話，還未分爲梵語，希臘語，日耳曼語，而是含有這些言語的方言的胚子底言語。此外繆勒還論述：英吉利人的兵士的血管中，流着與黑色的孟加拉（Bengali）人同樣的血液，現在無論怎樣的陪審官，若果查起所謂言語這個往昔貴重的證據書類來，恐怕沒有不承認，痕都（Hindus）希臘，條頓等人是同一祖先的後胤，正統的血緣者吧！這種學說，當時的情形，是大大地爲人所尊重，如前所述，在當時幾乎都被認爲學界的定說，相信：分布於亞歐兩大陸之間的同一語族，本來不外是占據中亞的一個地域底一小民族底後裔，而不疑。我以爲：此時決定這個問題的必要的各種學術，尙未十分發達，因爲有如繆勒，在梵語學界，歸集一代的信望底大家，熱心主張的學說之故，使普通人沒有非難的餘地，其間不是沒有懷抱異議的學者，但是那些異議，幾乎不爲人所顧及的樣子。

可是，歐洲十九世紀學術界的進步，不獨在言語學方面，有了大的發達，就在人類學，史前考古學，地質學各方面，也有了大的發達；從來主要地是爲言語學者所研究的這個問題，當然也爲這些新興科學的研究者所考究，因而他的所見，有的與前述的學說不相容，這些主張，逐漸爲人所重視，便使雅利安民族的中亞起源說，發生了動搖。換言之，根據人類學者，尤其是頭蓋學者與史前考古學者等等，蒐集幾多貴重的資料，而研究的結果，則現今西班牙，法蘭

西，丹麥，德意志，英吉利這些廣大地域的住民，大部分非說是新石器時代，甚至於舊石器時代，便占據同一地方的未開化民族的後裔不可，而與上述言語學者，依據言語的比較研究，而立論的思想，不一致，如是一時有如定說的學說，便逐漸失去了他的光彩了。加之，依據言語學者自身所推進的言語底古生物之研究，對於這種學說，也沒有得到好的結果。若果所謂雅利安人，是發祥於中亞的話，則這個地方出產的動植物的名稱，當然非在其原始語中存在不可，但却沒有發見出來，反之，歐洲方面出產的古生物的名稱，却有存在其中，這就使雅利安人從裏海東方移住來的學說，發生妨礙了。這種學說，最先於一八六八年。爲本淮(Bentley)所主張，將其搖籃地求之於黑海的北方的，便是他自身的思想；接着，蓋革(Geiger)依據同樣的研究方法，更將此求之於西北，以爲將其搖籃地放在中央及西方德意志那個地方，是最妥當的。在其前後，關於雅利安人的發祥地的學說，頻頻出現，全無歸一的樣子。但是通過這些學說，而可以承認的事實，是：承認言語分布區域的擴大，是跟着民族的分布而擴大底現象，即是豫斷：雅利安語的擴大，是由於雅利安人自己的移住的。一八七一年庫諾(Cuno)對此主張，以爲應該看做是雅利安人，在征服其他民族，或將其文明傳之於隣接民族的過程中，廣布其言語的，指示出：北歐的平原爲雅利安民族的發祥地；但是言語分布的事情，自然可以承認這種主張，可是沒有因此來決定雅利安人的根據地的問題底道理。情形就是這樣甲論乙駁，而不知底止；在此更想敘述一位有名的斯刺德(Schrader)的學說。總之，他的結論，以爲雅利安人的根據

地，非分做二個不可，一是北歐的歐羅巴雅利安人的根據地，二是中亞的藥殺水地方的亞洲雅利安人的根據地，關於前者，則他說沒有可以承認其由東方移住至此的理由，有證據存在的最早時代，他們便不住地擴展到南方與東方，以爲言語分裂以前，他們占據的地方，非求之於阿爾卑斯（Alps）之北不可；關於後者，則說梵語的民族，是從西北入印度，於吠陀（Veda）時代，住於印度河岸，關於恆河，只有間接的知識而已。他以爲印度人與伊蘭人，都是一起住在喜馬拉雅北方的某地的，兩者都有關於藥殺水的傳說，他的早期的居住地，非在這條河岸尋求出來不可；關於雅利安人的歐亞兩個根據地之中，那一個是其本源地呢？則沒有發表積極的意見，而且將其根據地置於西方，似乎是合乎事實的。取其非常緊要的東西，而不唐突，便非承認這種學說的妥當不可。

如是，風靡一世的雅利安人之中亞起源說，逐漸失去其權威，例如曾經信奉這種學說的舍斯（Sayce）教授，以後鑒於各種新說，至於改變前說了，但是，並不是以此決定其本源地是在於歐洲，歐洲說之中，除去前述諸說以外，依然諸說紛紛而無所歸一，有的以爲是東歐南俄地方，有的又以爲是在北方的波羅的方面。而近時這個問題的討論，更有返盛之觀，民俗，考古，人類，言語等等學者，各以其學問，用力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如中亞起源說，也尚有勢力。而且結果那一種學說，也是不滿足的，尙看不到決定的解答。現在最可以肯定的意見，應推前述斯刺德的學說。這種學說，不單站在言語學上來考究，是妥當的，就站在傳說，宗教，

一般文化，與其他各種相關的學術上來考察，也無妨礙地似乎是可以說明的，例如一九〇三年及一九〇四年，有名的潘培萊（Pumpelly）在阿瑙（Anau）發掘的結果，雖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但也不是妨礙這種見解的。若果將範圍限於狹義的雅利安族——印度伊蘭族之間，則可以承認：這種見解，是可以得到多數學者的一致的。

以上所述，是極其簡略地記述：將這個地方的一地域，看做雅利安族的發祥地的學說的過程，同時反復論述：這個地域是在何處，與其發祥時代，是什麼時候的問題。但是在此避免這些問題的論述，只敘述：所謂雅利安族，我以為大概是相當悠遠的時代，發祥於錫爾河，即藥殺水流域的吧！

可是，這樣悠遠時代的事實，暫時不要管牠，大約推定年代紀元前一千五百年頃，他的一部，入印度，驅逐了非雅利安人的先住民，漸次扶植了他的勢力，同時另外一部，是入波斯，又在那裏占到了勢力，中亞及波斯方面的同族，稱為伊蘭人，這可以說：如前所述，不外是雅利安語的別種形式而已。在記錄時代的當初，從錫爾，阿母兩河地方起，更越阿母河而至波斯，這一帶，不用說，是這個民族佔據着的，他的情形，順次，依據下面的敘述，而可以知道吧！

中亞史的曙光時代，分布於此的民族，是怎樣的民族呢？——這大概是如上所述。總之，承認：幾乎他的全區域，是住着雅利安人，或類似雅利安的民族，他的一部分，混有我們以為

類於突厥族的民族，而無大過。這些在後世怎樣發生變化呢？則依據下面的敘述，而可以了解吧！

第三章 中亞史的曙光

依據從紀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之初止，居留於波斯，蒐集關於東方的知識底希臘史家提細阿斯 (Ktesias) 遺留下來的記錄，可以知道作為波斯阿肯米尼 (Acaemenia) 王朝的始祖，而為人所知悉的居魯士 (Kyrus) 王，越過鳩水，而征伐翠利在其東端建設了居魯坡里城 (Kyropolis) 的市鎮。生存於紀元前後一世紀的斯特拉奔 (Strabon) 的地理書 (Geographia) 中，也紀載着：這個市鎮是居留士王最後建設的，臨藥殺水，在波斯帝國的極界。建設這個市鎮是為着防止藥殺水對岸地方的遊牧人種，——可以包括希臘人所謂塞種 (Scythians) 的汎稱來稱呼的部族——之侵入，他的位置，普通都以為是現在的撒馬爾罕 (Samarkand) 東方的貳師城 (Uratube)。換言之，在紀元前六世紀後半的時代，屬於伊蘭人種的大征服者與遊牧人種的對抗之中，這個地方的歷史，便發出他的曙光。但是祆教的經典增得亞味斯達經 (Zend Avesta) 之中，始有 Ahura Mazda 的神，在大夏 (Bactria)，那是現在的巴里黑 (Balkh)，最初製造人，覽翠利，大夏等等的名稱，屢屢看得見，其次提細阿斯解釋亞述 (Assyria) 盛時各方討伐的傳說，而說翠利當時已在其中；這些都很難認做是關於這個問題的確實的史料。

其次同一王朝的大流士 (Darius) 王，於紀元前五二一年頃，使人在岩石上彫刻其武勳的有名的 Behistun 刻文之中，有如次的記述—— Margiana 地方(即今之木鹿 Merv.)，地方叛

變之時，王使其臣下，大夏的知事 Dadarschish 討伐之，使其歸服的記事；其次列舉王的屬領地區之處，看得見 Parthava (Parthia)、Zaranka (Drangiana)、Haraiva (Aria)、Uvārazmia (Chorasmia)、Bākhtris (Bactria)、Suguda (Sogdiana)、Gandera Saka 等等的名稱。此外尚有同樣記載王之武功的波斯玻里城 (Persepolis) 的刻文，和那據說是造於紀元前四八六年的羅斯旦 (Nakhs-i-Rustam) 王之墓碑等處，也記着這些名稱；紀元前五世紀之時，尚在人世的稱爲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 (Herodotus) 也於列舉大流士王所定的納稅區域之處，記有安息 (Parthia) 人，呼羅珊 (Chorasmia) 人，翠利 (Sogd) 人，雅利安人等等的名稱。這些文獻，是最古的記錄，明白地證示出：這個地方，在阿肯米尼朝波斯的統治之下。這些地方，尤其是大夏及翠利地方，是伊蘭人的故鄉，古者伊蘭的生命，特別顯著地在大夏脈動着的事實，乃是波斯一切的傳說互相一致之處，例如伊蘭文明的精神——祆教，實在是最先在這個地方宣揚的。即是：居魯士王的嗣子羅拉斯布 (Lohrasp) 在大夏，建造火的祭壇，繼其位的固休達斯布 (Guštasp) 也在此處，此時，瑣羅圖斯特刺 (Zarathustra 即瑣羅亞斯德 Zoroaster) 親來此地，祈禱羅拉斯布王的疾病，而益得固休達斯布王的信賴，聽說他的王子易斯分狄雅 (Isfendiyar) 曾爲這種宗教的宣布而討伐各方。

藥殺水流域的某一地方，是雅利安人的搖籃地這種意見，是如前章已經敍述的一樣；但是由那裏向南向西移動的伊蘭人，最初應該遭遇到的藥地，必然是肥沃的那密水 (Sarafshan) 河

流域的翠利。這個名稱，是將其原名 Suguda 詭爲希臘語的形樣的，原名的意義，聽說是：美麗地創造起來的神聖清淨之地的意義。我想：在其原住地一定是經營遊牧生活的伊蘭人，是在其移動之初，遭遇到這塊肥沃優美之地，而入於定住的農耕生活的。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呢？固然是不能明瞭地知道的；但是進入有紀錄的時代，而看見翠利這個名稱之時，他們之間，大概是以那種宗教爲中心吧；他們橫溢着獨特的伊蘭精神，燃起對於侵入此地的侵入者的敵愾心，不絕地與藥殺水彼岸的遊牧人種相鬥爭，這種事實，是可以從傳說與記錄上，認識出來的。如下所述，當亞歷山大大王，以席捲波斯之勢，侵入此地之時，他們常常表演出挫其銳鋒，而陷之於危地似的話劇，也非認爲是這種精神的發揮不可。

有如斯特拉奔與其他的人們所記述的一樣，當時媯水南方的重要地方，不用說是大夏。在翠利地方，被認爲中心地的，是現在的撒馬爾罕，——即是那時希臘人的記錄中看得見的 Maracanda。依據被說爲紀元後一世紀的人底羅馬著作家古耳狄烏 (Curtius) 的記述，則亞歷山大攻擊 Maracanda 之時，這個城鎮有內外兩城，各圍以城壁，外城的長度計七十 Stadium (每一 Stadium 約合一八五公尺——譯者)，這個地方臨那密水河，我以爲當時運河也開通了，他的肥沃的情形，看希臘人的記錄，是很可知道的，後來阿拉伯的地理學者，將此地算入他們所知道的世界四個樂地之一。

與撒馬爾罕一起，我以爲在當時必定繁榮起來了的不花刺 (Bokhara)，却關聯到亞歷山大

的侵入，而在紀錄上看不見，是不可思議的事實；學者之中，有人將馬拉罕達解做翠利的一個都城，另外只記翠利的，即是指這個不花刺而言，所以翠利一方面是地方名，同時又是都城名，後世的情形，是將撒馬爾罕作爲翠利的夏都，不花刺作爲他的冬都，在當時我看也是同樣的。如果這種主張是正確的，則我不可不作如次的視察——翠利地方，以撒馬爾罕與不花刺爲中心，伊蘭人，在初史時代，以其獨立不羈的精神來對抗外族的視察。

關於中亞的其他地域的記載，也有爲希羅多德以下的若干的作者所傳述，但是那些無論那一個都非常缺乏明瞭，稍爲可以知道其明確的情形的，乃是中國漢代以後的事。

第四章 亞歷山大的東方經略與大夏及安息

波斯阿肯米尼王朝的勢力，爲馬其頓的英雄亞歷山大大王的東征所粉碎，紀元前三二一年高加米拉(Gaugamela)戰敗之後，其王大流士三世，逃於東方，爲大夏的太守柏薩斯(Bassus)所殺害。亞歷山大又討柏薩斯，於紀元前三二九年，入大夏，更窮追之，越過媯水，由於三年間的活動，完成了從大夏到塞利一帶的經略，與其他地方一樣，在藥殺水岸建築亞歷山大城。這個地方，普通當於現在的俱戰提(Kohdjend)。這種經略，對於容易席捲波斯的亞歷山大，似乎遭到意外的困難，時時演出馬其頓軍大敗北，大王自己也陷於危地而受到創痍的事實。平定塞利以後大王便回師大夏，將這個地方，作爲馬其頓勢力在這方面的根據，而使之穩固，紀元前三二七年，更南下而攻略印度。其後四年，即三二三年，亞歷山大在其光輝的凱旋途中，不圖病歿，如是用大王之武略與兵士的血潮換來的馬其頓領各地，忽然陷於內亂的狀態中，世界帝國的大理想，消而爲夢，割據各方的武將之獨裁政治出現了。紀元前三〇六年，塞琉卡斯·泥卡托(Selucus Nikator)攻入大夏，征服他；但是及其更侵入印度之時，便爲孔雀密薩(Paropamisus)的地方，而講和了。但是，不久，三〇一年，塞琉卡斯統一了全部馬其頓領的亞洲，在此中亞也確實置於塞琉息(Seleucides)王朝的統治之下了。

此後五十年間，關於大夏，幾乎什麼事情也不能知道。然而，紀元前二五六六年頃，安都卡斯二世(Antiochus II)的時代，大夏的知事帶奧多達斯(Diodotus)背叛塞琉息建立了所謂大夏的國家。我以為是：當時安都卡斯與埃及戰，沒有遠顧大夏的餘暇，所以威令不行，大夏，便對此不屑盡其從屬的義務，而企圖獨立的吧！但是這種獨立，不過單是統治大夏的希臘政權，對本國塞琉息王朝政權的獨立而已，這個地方，依然是在希臘人的統治之下，是沒有什麼變化的。然而幾乎與此同時，即紀元前二四八年，在大夏的西隣安息(Parthia)，則敢驅逐希臘政權，看到安息人建設的國家之獨立。

安息人民，是屬於伊蘭種，在現在大概是沒有疑問的。此時有叫安爾薩息(Arsaces)的，被逐出本國，逃到奧卡斯(Ochus)流域的同族達赫(Dahae)族之間，但是，這些反抗希臘人在安息的虐政，而翻起叛旗，終於回到本國，殺其知事，自己建立了安息王國。是所謂安息王朝，以奧卡斯流域為根據地，(奧卡斯河，我以為是現在的提真德(Tedjend)河，或阿特勒克(Atrek)河等等)中國所謂的安息國，便是指這個王國。如是安息建國的事情，本來是基因於國人之間強烈的反希臘思想的，所以亞歷山大以來，在政治文化上於此地扶植起來的希臘勢力，便完全為其所驅逐，重新見到安息本來的精神之發現。

然而，若果概述以後大夏的情態，則關於帶奧多達斯是：紀元前二四五五年之頃，帶奧多達斯二世，繼帶奧多達斯而即王位，不久二三〇年頃，攸替德摩(Eutydemus)篡奪了他的王位。

在塞琉息朝，則比此稍後，二二三年，安都卡斯三世(Antiochus III)立，討伐安息王阿塔本奴(Artabanus)而締結和約，二〇九年頃更討伐大夏，擊破攸替德摩的軍隊。攸替德摩對此攻擊，聲稱借殺藥水彼岸的遊牧民塞種(Scythians)人的援助，來威脅安都卡斯。如前所述，大夏也可以稱爲希臘勢力在東方的前衛地，使此地歸於他們所謂的蠻民之手，則最先非招致他們的勢力之破滅不可。所以安都卡斯，終於和攸替德摩締結和約，承認其君臨大夏，率軍而入印度。

作為大夏王的攸替德摩的權力，及到什麼地方呢？這是不明白的；但是從其貨幣的分布狀態考察起來，則不單及到大夏，與塞利南越興都庫什山脈的地方，似乎也及到某種程度。繼攸替德摩之後的，是有名的狄麥多流(Demetrius)，即位於紀元前一九〇年頃。該王更越過興都庫什山脈，占領從喀布爾(Kabul)迦布羅到印度河上流的五河地方(Panjab)一帶的地方。斯特拉奔也說：希臘人因大夏的肥沃與勝利而服從了由現今的阿富汗到印度河流域的地方。而以此一部歸功於麥喃得(Menander)，一部歸功於狄麥多流。所謂麥喃得這個人，可以認做：是巴利文佛典中看得見的米林得(Milinda)，漢譯佛典的彌蘭德。

希臘人的勢力，南越興都庫什，而及到喀布爾河，繼續維持這些勢力，決定了將希臘文明移植於印度的基礎的，是狄麥多流以後的事情；在其以前，是如前所述，乃是亞歷山大塞琉卡斯及安都卡斯等人，各各侵入了印度，但是那些都不過是一時的現象而已，尚不至於發生使希

臘文明光被於嶺南之地的顯著的影響。由此觀之，則狄麥多流的經略嶺南，是非大大地注意不可的。

如是，大夏占領橫瓦嶺南嶺北的大領土，而現出他的極盛期，大夏的城市，作為他的首都，而大大地繁榮了，乘狄麥多流從事其嶺南經略的空虛，紀元前一七四年頃，幼克拉替德斯（Eucratides）在大夏本地叛變了，即王位，在此與狄麥多流之間表演了長期的戰爭。這個戰爭，結果是狄麥多流的敗北，似乎於紀元前一六〇年頃，為幼克拉替德斯所殺，或被其逐出王位。然而，幼克拉替德斯在戰勝狄麥多流而凱旋於大夏的途中，一五六年頃，為其子阿坡羅多達（Apollodotus）所殺，阿坡羅多達不久又為其兄弟希利奧庫列（Heliocles）所殺。希利奧庫列即是希臘人建立的大夏王國的最後的君主。

當時塞利地方的狀態怎樣呢？現在還沒有可以闡明這種狀態的資料；但是我想：大夏末期諸王的時代，他的支配幾乎沒有達到此地之時，便衰弱了，而藥殺水彼岸的遊牧人種，漸次伸延其勢力而來了！

可是，大夏在這樣的混亂狀態之時，乘機發展勢力的，是其西隣的帕提亞。安息一世在位僅二年，就戰死了，其弟提里達德斯（Tiridates）即位，造出漸次發展的形勢。塞琉息朝的塞琉卡斯二世（Seleucus II），討伐他，但是提里達德斯得到塞種一部的援助，戰而大勝之。這種勝利，意義到實際上的安息的獨立，擊破敍利亞的常勝軍的誇耀，愈使安息增盛其反希臘的活

動。安息的首都，是希臘人所謂的喝克場白洛斯 (Hecatompylos)。提里達德斯厭惡首都的希臘色彩，想遷都於占形勝位置的達拉 (Dara) 城。這不外是想驅逐希臘文明，發揮帕提亞文明的神精的表現而已。

其後三世出了有名的大王密司立德提 (Mithridates 174—136 B.C.) 在此創出安息的極盛期，開拓了大的版圖，東從越過興都庫什的印度河流域，西到幼發拉底斯河。招致這樣盛連的原因，不外是一，因為由於前述大夏末期的內爭而起的混亂狀態，二，是乘塞琉息王朝多事於埃及及西方，不遑東顧之故。

密司立德提以後，其子夫拉德提 (Phradates) 二世立，又與塞琉息朝戰而破之，當此戰時，招致塞種 (Scythian) 部族，變成禍根了，結果陣歿於對塞種的戰爭中。元來利用塞種的武勇，乃安息興起之時以後的慣例，如前所述，不單安息，就是大夏危急之時，也想借援於此。而同樣的事實，在其以後，也常常在史上反復表演着，恰似中國與塞北民族的關係一樣，要之，亞洲的未開民化族與開化民族的南北對立，是通古今而可以認識出來的現象。接着新王阿塔本奴 (Artabanus) 一世立，此王也與塞種族中的吐火羅人 (Tokhari) 戰，於紀元前一二四年頃戰死了。

所謂吐火羅族，不外是斯特拉奔說的：「塞種人之中，最聞名的，是奪取大夏的 Asoi, Pasianoi, Tokharoi, Sacarauroi 等等，從藥殺水彼岸來的」四部族之中的吐火羅而已。換言

之，即是這些塞種族漸次進行南下之勢，終於奪取了大夏，而希臘人在此地的勢力，以前述希利奧庫列王爲最後，不可不退到興都庫什之南了。

但是，大夏的希臘人，實是從狄麥多流與幼克拉替德斯之時起，就次第移入嶺南，尤其是乾陀羅(Gandara)地方了，因而大夏漸漸空虛。總之，如是，亞歷山大東侵以來，約略二百年之間，其勢力雖有隆替，但是繼續佔據可以說是伊蘭文明的發祥地的大夏底希臘人，在此便爲人驅逐出去了。

第五章 民族之移動

現今陝西省的北部地方，從中國的殷周時代起，就爲匈奴種族所據，與漢民族相接衝，是無疑義的事實。匈奴之西，今之甘肅省，尤其是他的西邊的燉煌地方，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大概是戰國時代，就已爲月氏種族占據了。其後月氏的勢力漸張，依據史記與漢書，可以知道：當漢初之際，已經發展到東方——現今甘州之南的祁連山地方，領有河西一帶。然而此時的匈奴，出了冒頓單于，振威於四隣，對月氏也加以痛擊，繼冒頓而立的老上單于更擊破月氏而殺其王。如是月氏棄河西之地，逃於現今之伊犁地方，驅逐在此居住的塞種族而代之，占據其地。然而佔據這塊新領土的月氏，不久又爲以匈奴爲支持的烏孫所擊破，再逃出此地，而遷於西方，擊破以藍市城爲國都的大夏國，使之臣服於己，自己在鳩水之北，建立王庭。塞族先爲月氏所破，馬上去伊犁而南遷，入罽賓——包含當時乾陀羅地方的喀什米爾(Kashmir)，更分散於各方。而本來的塞地，——伊犁地方，却新爲打破月氏的烏孫所據。如是以甘肅省內的月氏，被匈奴討擊，爲基本原因，使之發生從中亞到印度的各民族的大移動。這種情形，都可以根據史記與漢書等等中國史料而知道的；但是這些事實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又是和前述斯特拉奔的著作等等西方紀錄中看得見的塞種人之南下相一致的事件與否呢？——這些問題是從來學者屢屢議論的地方，在此想簡單地敍述我的見解。

月氏離開甘肅的年代，除了說是匈奴老上單于的時代（紀元前一七四——一六一），尤其是一七二年以後的某一年以外，是不能考定更精確的年代的。這是從來已經說過了的。因而塞種族從伊犁移動的年代，也非看做是與此相接近的年代不可。月氏之第二次的移動，即是從伊犁移到西方的年代，自然不能明白決定其年次的，但是如後所述，張騫受武帝之命，向月氏出發之年，——紀元前三九年頃，月氏似乎尚在伊犁，其後十年餘，張騫終於達到月氏之時，月氏已經安住於媯水之北了，所以他的移動，可以認做是在這十年之間發生的。烏孫的佔領伊犁，不用說是緊接以前的事件。

然而史記上記載的以藍市城爲國都的大夏國，普通承認的學說，是當於西方記錄中，以大夏爲國都的吐火羅國，所謂塞，是當於他的Saca。吐火羅是前面敍述的，攻殺安息的阿塔本奴王，和那從藥縠水彼岸來的三部族一起南下，滅亡希臘人的大夏國的塞種族的一部，大夏滅亡後，其地是用這個吐火羅之名，而爲人所知道，羅馬奧古斯都（Augustus）時代的歷史家波利彪（Trogus Pompeius），與二世紀時有名的學者托勒米（Ptolemyos）等等都是傳述這個名字。我以爲：大概是這個部族，與其他三部一起滅亡了大夏，但是這個部族，是最優勢的，此後原來的大夏地方，便是用其名來稱呼的吧。月氏滅亡這個吐火羅——大夏，是張騫到達這個地方的紀元前一二九年，或是一二八年頃以前的事，所以大夏的滅亡，也是在其以前；有幾位學者，將此推定爲：紀元前百四十年頃，大體非看做得當的主張不可。

第六章 漢之西域經營

中亞與中國的政治交涉，開始於漢武帝（紀元前一四〇——八七）之時。漢高祖爲匈奴的冒頓單于所苦以來，常常對匈奴，採取和親的態度，但至英主武帝之時，便想討滅匈奴，因此想與對匈奴有舊怨的月氏之間締結同盟。張騫之西使，即是爲此目的，更不用再講了。張騫的使命沒有達成，但是因此漢與中亞諸國之間，可以互相知道對方的事情，由此逐漸發生交涉。

武帝元朔七年（紀元前一二二年）將軍霍去病，攻略現今甘肅省之甘州地方，其結果，此地之匈奴部將，降服於漢朝，從中國通西域的咽喉，爲漢所支配。如是漢在此化外之地——今之肅州，設置酒泉郡，漸次移關東之民於這一方面，武威（涼州）張掖（甘州）敦煌（燉煌）等々，合設四郡，使漢之勢力，發展於此，一方，又從陝西山西方面追逐匈奴，元狩四年（紀元前一一九年）頃，完全將其驅逐於漠北。然而武帝尚未滿足，進而想殄滅匈奴，又遣使張騫策劃與烏孫之間的同盟，建立了東西挾擊之計。這個同盟計劃，也與從前的月氏的場合一樣，沒有成功，但是跟張騫一起到漢朝的烏孫的使者，回國後，傳述漢朝強盛的情形，烏孫王請漢尚其公主，終於成功了兩者之間的連衡。

「張騫使烏孫之時」，更分遣副使於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大宛，當於現今的拔汗那（Fergana）地方，康居我以爲他的勢力及到了從碎葉川（Chun吹河）到撒馬爾罕。這些使節，各

伴其國人，歸到漢朝，製造機會，使西方諸國知悉漢朝的事情，使他們增盛通漢的希望。

如是，漢與西域諸國的關係，逐漸密接的機運作動之時，更發生武帝征伐大宛的事件，將漢朝威光重新輝耀於西方。本來漢之經略河西地方，進而想招致西域地方的主要目的，是想由此以折斷匈奴的右臂，控制其勢力的，由其派遣張騫之時的事情，與其後經世家屢屢建言的地方而可以知道的一樣，他的主要目的，不外如此。但是逐漸通曉西方諸國的事情，一知其土產中有珍貴的東西以後，馬上便生出獲得此種土產的希望，是當然的事實。西方的產物之中，特別使武帝垂涎的，是大宛的馬。大宛，康居地方一帶，作為名馬的產地，老早就有如希羅多德的記事中看得見的一樣，是有名之地。武帝得其馬而珍重之，常遣使者，頻頻求之，大宛討厭而且厭惡漢使之橫暴，終於殺害使者。於是武帝也不顧道途的困難，遠遠地派遣大宛討伐軍，終於大初四年（紀元前一〇一年）依大宛之請，締結和約而班師。於是漢之威光輝耀遠近，首鼠兩端的烏孫、康居等等，在此也不憚匈奴而通好於漢了。但是西域諸國之中，天山南麓的東邊地方，尚在匈奴的勢力之下，妨礙漢與西方的往來，所以漢昭帝之時，在此地施行屯田制度，使漢兵常住於此，保護往來的使者，講求供給糧食的方法。但是漢威力普及於這一方面，是宣帝神爵二年（紀元前六〇年）鄭吉用西域都護的名義統治這個地方以後的事實，在此，匈奴從來及於西域的勢力衰亡了，天山南路這個地方，完全歸服於漢朝，同時漢朝也不從這一方面受到匈奴的威脅了。

在天山南路的諸國，即是狹義地稱爲西域的地方，當時存有三十六國，到漢末更數到五十餘國。本來那些所謂國家，不過是各以城邑爲中心的一小地方而已，其中沒有出現統一這些國家的勢力，那時的情勢，只是個別地隸屬於匈奴或漢朝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國家，是諸國中最近漢朝的，當時在天山山脈南麓地方的所謂北道諸國；崑崙山脈北麓地方的所謂南道諸國中，通任何一處都要經過的樓蘭（現今的羅布泊之南，武帝時改名鄯善）；沿北道則是車師前國（今之吐番附近），焉耆（哈喇沙爾），龜茲（庫車），姑墨（阿克蘇），溫宿（烏什），疏勒（喀什噶爾），沿南道則是于闐（和闐），莎車（葉爾羌）等等。漢之西域都護，駐於龜茲東方的烏壘城，統督這些國家，兼督察烏孫，康居等等外國。統督這些國家的都護政治之主要目的，是一，監督這些國家，防止匈奴的勢力及於此地，二，保護以西各國與漢之間，所行的交通貿易之安全；不是從這些國家，榨取過重的稅物，以求經濟上的利益，自己深涉實際上的政治的。這一點，對於各國，比較在匈奴的苛斂誅求底統治之下，來得有利，所以在其他地方，不伴生特別難堪的事情底範圍內，他們是常常希望服屬於漢室的。如是漢初西域都護鄭吉以來，通過漢代，而在任的，計有十八人，其間大概漢之威令，可以行之於西域。然而王莽一篡立，則其輕侮的態度，置了各國的不信任，諸國之中，又有通匈奴而背叛都護的。

雖然漢室馬上復興了，但是當初關門關閉，與西域的交涉斷絕了，所以西域各國互相戰爭，其時，匈奴的勢力，又伸展於此地了。明帝之時，一方面從事於匈奴的討伐，同時更開始

西域的經略，將其全生涯奉獻於這種事業的班超，於和帝永元三年（九一）大略達到了目的，又鎮服龜茲而爲西域都護。但是後漢的西域經營，方針不定，這一代是所謂三通三絕的狀態，桓帝元嘉二年（一二六）之頃以後，漢威完全不及於西方了。

第七章 貴霜王國

月氏從甘肅之地移於西方之時，另有一部分月氏，殘居於南山的地方。所以在中國的史乘上，將其西遷以來，遷於南方的，稱爲大月氏，殘居於南山的稱爲小月氏。可是大月氏征服大夏以後，沒有表示出怎樣的發展，——關於這件事實主要的非根據史記、漢書、後漢書等等的記載不可。然而這些史書記載的，不一定一致，因而關於應該根據那一種，怎樣來解釋的問題，則非加以精細的研究不可。在此省略關於這個問題的我的研究經過，只記述作爲結論而考察到的東西。

服從大月氏的大夏——吐火羅，有相當於將軍的五位翕侯，這些翕侯皆各有領土，服屬於大月氏。他的領土的名稱，呼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高附。這位貴霜翕侯之丘就郤時代，滅了其他的四翕侯，而自號爲貴霜王，更併有安息——暨其他各國，其子闍君珍時代，又滅天竺，而更加富盛了。這位吐火羅族建立的貴霜王家，是西方記錄中所謂的 Kushan 王家，有名的迦膩色迦王，便是這個王家的人。在中國，也將這位王家，說爲大月氏，那不外是基因於大月氏征服了大夏的關係，而便宜上將這個大夏人的王朝也如是稱呼而已，其實，不應稱爲大月氏，漢人自己也是很知道的。貴霜翕侯的領土，是沿着葱嶺而達大夏的交通路底護密（Wakhan）的谷地；大概後漢時代，出了丘就郤（貴霜朝的 Kujula Kadphises），與其子闍

膏珍(Wema Kadhises)父子兩王，領有其他四翕侯的領土（從護密之西到大夏的興都庫什之北的地方）暨前記諸地方，而造成盛大的勢力，其後，出了有名的迦膩色迦王。那麼，由甘肅西遷的月氏——大月氏，與大夏或貴霜王朝的關係怎樣呢？這在現存的史料上，是完全不能知道其消息的。漢書記載大月氏都於大夏之都的藍市城——Bactria 是不足信的。是混入於吐火羅人之間的吧，他的大部分依然殘留於山燭水之北到塞利地方吧。依據南北朝時代以後的記錄，則塞利地方各國的王家，是這派大月氏的後裔。

貴霜(Kushan)王朝的年代，是很有爭論的問題，但是在此只記述二件事實。——一，丘就郤，闍膏珍等等的活動，大概是進入後漢以後的事實；二，以後出的迦膩色迦王大約應該看做二世後半的人。

貴霜王朝，將其勢力，在怎樣的程度以內，及於中亞呢？這是不明瞭的。惟班超從事於天山南路的經略當時，他已有援漢而討伐車師的事實，又於永元二年（九〇年）出大軍攻班超，結果貴霜軍終於敗北，以後便知其通好於漢。這大概是前述丘就郤或闍膏珍的時代發生的事情吧！此時康居、烏孫，都具有勢力，各據其從來的地域，所以貴霜朝的勢力，北方大體以燭水流域為限，與班超的接觸，只有從葱嶺之西，或南方來進行吧！班超是南越葱嶺，出入到辛頭河的上流地方，這一定是對於占領這個地方的貴霜勢力的行動。跟着，一入迦膩色迦王時代，他的勢力就越葱嶺，而及到天山南路的地方，是一般人可以承認的。

第八章 嚈噠突厥的活動

我以為貴霜王朝，於五世紀之半頃，已經完全滅亡了，那是因為：一，西方爲波斯薩珊(Sassan)朝——阿爾達希爾(Ardashir)打倒大夏，於二二六年開設的王朝——的勢力所壓迫；二，從北方媯水彼岸那方面來的嚈噠(Ephthal)種族，南下逼迫來了之故。這個嚈噠在中國南北朝時代的史乘上，是用嚈噠，悒怛等等文字來記述的種族。北魏時代，蒙古種族的蠕蠕，在漠北強盛了，如烏孫，也因其而棄從漢以來就佔據了的伊犁地方，橫亘沙漠的南北，而與魏相爭。嚈噠便與這些蠕蠕相結合，廣汎地活動於阿爾泰山脈以西的地方，從窣利越過媯水，而侵略當時陷於衰態的貴霜王國，還將其勢力及於波斯。本來嚈噠是遊牧種族，伸其勢力於媯水南岸以後，便建都於拔底延城——Bactria 才漸次入於城廓生活的。他的興盛時期的領地是：從伊犁到窣利，從以 Bactria 為中心的吐火羅斯單(Tokharistan)越興都庫什，而及於乾陀羅及鶴悉那(Ghazni)地方，西是注入裏海的庫爾干(Gurgan)河地方，東則從葱嶺及到天山南路之一部，北魏不用說，五一六年還遣使到南朝的梁而通好。這樣盛運的嚈噠，於五六〇年代，也遇到滅亡的命運了，那是因爲對於年來被其所壓迫的波斯之反擊，與新興的大勢力——突厥的攻擊，不能對抗之故。

突厥的名字，從南北朝時代起，就出現了，在中國，是用這個名稱，來稱呼當時廣布北方

的突厥族中之一部。這一部的發祥地，被記做金山——阿爾泰山之南。元來是屬於蠕蠕的，但是從西魏的時代起，表現了大的勢力，於六世紀過半之時，終於滅了蠕蠕。突厥是北方的民族的兄弟可汗，分爲東西兩部，東部占有外蒙古地方，西部佔有本來的烏孫之地，當時爲嚙噠所領有的地方，在天山山脈中的龜茲之北底溪谷中，設置王廷，更漸次進行經略。後者被稱爲西突厥，滅亡嚙噠的，便是這一部。

嚙噠的討滅，是波斯與西突厥相協力，由東西兩方挾擊的；但其後，波斯恐忘突厥的勢力及到自國，努力想回避與突厥的直接交涉。例如：新服突厥的翠利地方的商人，利用突厥與波斯的親善關係，恐直接入波斯，來擴張絹的販路，所以突厥派遣特使要求波斯的承認，但是波斯因爲如上的恐忌，頑強地拒絕了突厥的要求，便是。結果，終於使突厥通好於當時和波斯是敵對關係的東羅馬，五六八年，突厥的使者，訪問君士坦丁堡，羅馬的報使，也答訪突厥的王廷，以後的情形，更使使者互相往來。突厥對波斯兩者的同盟，締結到什麼程度呢？其次同盟締結後，得到如何的功果呢？這二個問題，在現今是不明白的，但是，總之，突厥是有力的存在，在，使東羅馬朝認識其勢力，是無疑的事實。唐太宗貞觀三年（六二九）由長安出發，開始西方旅行的玄奘三藏，通過西突厥的領內之時，在位的可汗，叫做統葉護，正是這一部族最甚的時代。依據他的見聞，則當時西突厥的情形，是西米特不用說，此外還中挾媯水，所謂吐火羅

地方——東接葱嶺，西接波斯，南接興都庫什，北接怯沙（Kes）底吐火羅地方，一切都役屬於他，更侵波斯，使其困於應付。（其後他的勢力，更伸展到從喀什米爾到乾陀羅的地方底事實，附記於此。）天山南路諸國，也在其勢力之下，也與唐通好，從對東突厥想盡苦心的高祖那裏，得到娶其公主的應諾。

統葉護以後，西突厥的勢力，沒有發展了，不久便分爲東西兩部，而互相鬥爭；雖然那樣，但是唐高宗顯慶二年（六五七年）討滅其以前，尙保持相當的勢力。

第九章 唐之西域經營與回教勢力之東漸

漢代以後，魏晉南北朝之間，中國因為內部分裂之故，不能如漢代一樣，遠遠地用力於西域的經營，但是，其間統一北方的人，或佔據西方的人，常常順從其經略，多少踏襲防禦北方民族，保護與西方的交通貿易底傳統政策。曹魏之時，漢時設置的戊己校尉之官，駐屯於漢時設置的高昌壁地方，——現在的哈喇和卓附近，從後魏時代，四六〇年起，在蠕蠕的勢力之下，闕伯周開始建立高昌國，以後才被呼爲國，——那時的情形，不單天山南各路國來通，就如魏時的貴霜王朝，東晉時代的大秦國，也未通好。十六國分立時代，佔據涼州的前涼，打倒前涼的前秦，打倒前秦的後涼，繼續後涼而佔據敦煌的西涼，割據甘州的北涼等等，都各自伸其勢力於天山南路。後魏因為一方面與蠕蠕是敵對關係，他方面因為統一北方而造成大勢力的關係，所以他的從事大規模的西方經營，遠超過魏晉五胡時代，世祖太武帝之時，四三七年，派遣使節到拔汗那，與者舌，——塔什罕(Tashkan)地方，招致那個地方的各個國家，又出軍征服天山南路的鄯善，高昌，車師，焉耆，龜茲等北道諸國，南道的于闐也有通交了。

隋朝統一後，煬帝西方經略之念很熾，甚至於親自巡幸河西，因為與突厥高麗等等的關係，所以沒有得到顯著的成績就停止了。至繼承隋代的唐代，西方的經營，完成了劃期的發展，在漢族威力的發揚上，表示出空前的光景。

唐之初期，天山北路的地方，是西突厥的根據地，天山南路與翠利，都在他的勢力之下，是如前面所述的一樣。因而當時的西域經營，不外是唐與突厥在這個地方的勢力之角逐而已。元來，當唐代興起之際，受了東突厥的援助之故，所以建國之後，也多受其威脅，高祖爲着對抗東突厥之故，採取懷柔西突厥的政策，太宗貞觀四年，（六三〇）終於滅亡了他。此後，西突厥與唐的關係，沒有特別緊張的狀態；但是西突厥發生內爭，勢力逐漸不振，唐之西域經營，便乘此而着着進展了。換言之，貞觀十四年，最初征服；從後魏時代以後九傳，到一百四十四年之間，漢人麴氏稱王的高昌國以後，便征服焉者，龜茲，甚至於使疏勒，于闐歸順，置安西都護府，使之統轄此地。

太宗一崩，西突厥的賀魯，便馬上背叛唐室，所以結果是高宗的討伐西突厥，賀魯奔於塔什罕，而爲唐軍所擒殺。如是西突厥之地，便放在唐之直轄勢力之下，遠從翠利到罽賓（喀什米爾）迦畢試（Kapisa）地方，也分置有唐之州縣。其後，到玄宗開化年間止，西突厥受唐之支配，而存續其勢力；但是，至此，他的一部突騎施（Turgash）抬頭而代之了。

此時大食——阿拉伯的勢力，漸次山西方東進，終於演成與唐之衝突。波斯的薩珊朝，因爲六四一年的 Nahavend 的戰敗，爲阿拉伯的回教軍所覆滅，他的遺子，來唐求援，打算回復祖業，而無所成就，是大家周知的事實。其後，大食益發進行其東方的經略，翠利歸其手中，是有名的 Kutayba 的征略的結果。Kutayba 於七一二年，降服翠利的中心——撒馬爾罕，繼

而從塔什罕入拔汗那地方，七一四年，越葱嶺而攻入喀什噶爾——疎勒。此時，是白衣大食（Omeyades）的海里發君臨的時代；但是應該注意的事實，是當時阿拉伯的侵略，不是占領這個地方，自己來統治，不過要求其侵略地納入租稅，集積財富而已；從其次的黑衣大食（Abbasides）起，這種情形，漸次發生了變化，自己來統治，迫侵略地的居民信奉自己的宗教了。所以在庫太巴的侵略以後，播馬爾罕的王也有遣使於唐，爲其一族，請求封冊的事實，有時突厥也有重新使其一部的地方服屬的事實。

如是翠利地方，一方面是接受東方唐之勢力，另外大食的力量又從西方及到此地，所以這兩種勢力，以這個地方爲舞台，而發生衝突，非看做到底不能避免的形勢不可。果然，發端於天寶九年（七五〇）唐將軍高仙芝答責石國——塔什罕回王之無禮而討伐之，許其投降，護送於長安而斬之，附近諸國便依附大食而請其援助，所以翌年天寶十年，（七五一）成爲唐軍與大食軍在怛羅斯（怛羅斯）河的會戰，唐軍大敗，如是西域經營發生一大頓挫。此後，不久，唐室因安史之亂，而國力失墮，沒有遠顧西域地方的餘裕，不久，天山南路的地方，有從唐初就發揮其勢力的西藏之進出，其他的地方，又有突厥的餘類，與回教軍的跳梁。

第十章 回鶻之西遷

如前所述，唐太宗是於貞觀四年滅亡東突厥，但是，不久太宗因為政策上的關係，再立其可汗，使其占據漠北的故地。其後東突厥勢力有消長，屢屢侵犯唐室，或者遠征到翠利地方，又屢有部下的叛亂，至玄宗天寶初時，終為他的部下回鶻部所滅。

回鶻部依然是突厥族，在此以前，從唐太宗時代起，已經表現出相當的勢力，也適好於唐。回鶻統一北方之後不久，唐室為安史大亂所苦，求回鶻的援助，才可以鎮定他。所以此後百年之間，回鶻對唐，極其橫暴跋扈，使唐不可不苦嘗其災厄。此時回鶻也有時出兵到翠利地方，振其威武，但是，要之，他的勢力，大體與東突厥相同，限於以鄂爾坤 (Orkhon E) 河為中心的漠北地方到漠南長塞之間；與阿爾泰以西的部族之間，始終在鬥爭的狀態中。

唐武宗時代，紀元八四〇年前後，回鶻因為內亂頻發與黠戛斯部的乘機侵寇之故，走入崩壞的運命中，部族逃散於四方了。其中的一部分，逃於西方，占據天山山脈之北，這一部分，其後經過二十餘年之時，向南進出，而占據高昌，在此興定此後所謂高昌回鶻的根據。從此以來，天山南路回鶻的勢力，急速進展，沒有幾久，籠蓋暨此地的其他各國，都歸其所占有了。依據某位回教徒的歷史家的記述，則有突厥族的王朝從九世紀半起，占據裴羅將軍城 (Pezang sagan) 又稱虎思幹兒朵在流經疏勒及現今的七河省的碎葉川 (Chu R. 河畔) 進而占有錫爾，阿

母兩河之間的地方，繼續到十三世紀初葉，學者之中，很多將此王朝認做回鶻部。別的回教的歷史家又說：回鶻部在十世紀時，占有從波斯東方的呼羅珊（Khorezm）到高昌地方的一帶地方，以龜茲爲都城。金史之中，也有記事，是以使人認出：回鶻占據遼代裴羅將軍城；但是這個回鶻，是更從天山南路進出的呢？又是他的別一派呢？或是因爲是他的同部族之故，可以大略一括而承認的呢？這些都不明瞭。

回鶻佔據天山南路以前，有一與此同種的突厥族的勢力，及於此地，是前面講過了的事實；他們之中，有的進住於這個地方，也是無疑的事實；而且回鶻部族從漠北這樣地遷移於此，非認出其重大的意義不可。爲什麼呢？因爲他們來到此地以後，便捨棄了從來的遊牧生活，化之所謂城廓之民，是自己佔據此地，這一點便與以前的北方人，使這個地方從屬於己的狀態之間，有了大的不同。從來雖然不知有幾回，是在北方民族的勢力之下，但其住民依然是雅利安系統的天山南路地方，至此他的人種才發生異動，歸來的民族，有的被驅逐，有的集團地被殺戮，殘留下來的，也因與新來部族的離婚，而漸次失去了他的特質；如是，這個地方，才出現所謂突厥斯單，即是突厥人的國家。

第十一章 蒙古之中亞經略與其以後

回鶻離開漠北以後，這個地方，尙未出現可以代替他的大勢力，諸部互相鬥爭之時，契丹，遼崛起於遼河上流，廣汎地使這些部族從屬於己。遼室滅亡之時，即一二四年，他的一族耶律大石，逃於西方，一一三二年頃，在裴羅將軍城的地方，建立國家。是所謂西遼，回教徒的歷史家，將此稱爲哈喇契丹 (Kara Kytai)。西遼的領土，從天山的東端起，西則包含錫爾，阿母兩河之間的地方，南達天山南路，使上述西遷後的回鶻部的大部分領土，歸屬於己。這個國家，以後維持其勢力於中亞，五八十年之久；但是一方面說是契丹人建的國家，他方面不過單單主權者及其周圍的若干人是同族而已，因此不至於使分布於這個地方的民族，發生人種的變化。進入十三世紀以後，蒙古的英雄成吉思汗的勢力興盛了，占據阿爾泰山地方的突厥之一部——乃蠻部，也爲蒙古的勢力所驅逐，逃於西遼，受其保護。然而不久這一部的首領篡奪了西遼，所以成吉思汗窮追此部，而佔領其地，進而更征服錫爾，阿母兩河之間的地方，裏海之南的呼羅珊及現在阿富汗地方。此時在蒙古，和現在一樣，將河中花刺子模地方的人，呼爲薩特回人 (Sart)。這是商人的意義，梵語上的意義也是一樣，是對於這個地方的居民，從古以來就巧於商業的特徵，而叫上的名稱，從突厥傳到蒙古，終於及到今日。但是這個名稱，本來不是用爲民族的稱呼的。如前所述，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以裴羅將軍城爲根據地的

突厥族，侵入兩河地方而佔領之，有悠久歷史的翠利人的國家滅亡了，他的民族，僅在與突厥族的雜種底姿態中，保存其面影而已。這種雜種人，依然擅長於商業，所以在此不外將商人，——沙爾得人的名稱，用爲這種人的稱呼而已。現在，沙爾得人，在其風貌上，尚具有伊蘭種與突厥種的雜種人的特徵。此外，佔據高昌的回鶻，於成吉思汗西征之前，已經歸附於蒙古，乃是有名的事實。

如是中亞這個地域，於成吉思汗時代，已經爲蒙古所佔有，成吉思汗將其所領，分給其諸子一族之時，阿爾泰山之西，準噶爾沙漠的北方，原來乃蠻部所據的地方，分給第三子窩闊台；他的西方一帶，到媯水止的地方，與天山南路地方，分給第二子察合台。換言之，中亞爲這兩汗國所分領，他們各在其領地內，安置自己一族與部下而統治之。因而蒙古族，與其他所領一樣，也廣布於這些地方，如後所說，縱使他的住民未至於蒙古化，但也在各地殘留其集團。

可是，在窩闊台汗國，其後出了有名的海都，與蒙古的宗室——元朝相爭，察合台汗家，大體的情形，也附在他的勢力之下；至十四世紀初葉而衰亡，他的領土，沒入察合台汗家了。察合台汗家從一三二一年起，也分裂爲：以不花刺(Bokhara)爲中心的兩河地方(錫爾，阿母)與其以東的地方二部；西部則內爭相繼而起，幾乎陷入無政府的狀態中。如是東部的汗，於一三六〇年，侵入兩河地方，而征服他，在此再看見察合台汗國的統一。在這種情勢之間，漸次

造成抬頭的機運的，是帖木兒(Timur)。

兩河地方，一爲東部察合台汗家所平定，帖木兒便仕於其下，不久乃驅逐這個王家，而君臨於兩河地方，建都於撒馬爾罕。帖木兒生於怯沙(Kesh)，是突厥文化所育成的回教徒；但是他本來是蒙古族出身的，若果追溯其家系，則與成吉思汗屬於同一家族。但是他的理想，是統一分裂了的蒙古領土，再造成吉思汗的偉業。這種理想，終於大略實現了，計平定波斯的伊兒汗國（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開拓的領土），從窩瓦(Seva)河到南俄的欽察汗國（成吉思汗之孫拔都開拓的領土），等等，征服占據小亞細亞的斡禿蠻突厥(Ottoman Turk)，侵略北方印度，連合東察合台家，進而向中國進攻明朝，而歿於途中。

帖木兒在其一代完成了這樣大的經略，是一個歷史上的偉觀；但是非更加注意不可的事情，是帖木兒乃從撒馬爾罕——兩河地方之一部勃興起來的勢力，古來沒有以這個地方爲根據，而出現大勢力的，在這一點，便非認做完全是歷史上的異例不可。若果考察當時的情勢，則不可不看出：因爲四隣都沒有大勢力的存在，所以這就是使這位英傑，立脚於這樣的地方，擅發其威武的原因。可是雖然如此，但其偉業完成的大部分，不可不歸功於：他是作爲蒙古族人的自覺中，懷抱恢復故業的大志之故。由是觀之，則這種大業，尚可收爲蒙古族活動史中的一齣，而應該如是吧！

伸展，常常反復內爭。一五〇〇年頃，占據裏海北方的月卽別(Uzbeg)汗南下而入撒馬爾罕，在此便看見這個王朝的最後。所謂月卽別汗，是蒙古的欽察汗的始祖拔都之弟昔班的子孫，占據裏海北方的領地而稱的名稱，他的部族，我以為是突厥族與蒙古族相混合的。恰好此時，帖木兒的五世孫八兒(Babel)以拔汗那爲根據地，熱心努力於祖業的恢復，與月卽別族相角逐，好幾回入了撒馬爾罕，但是結局沒有達到他的志願，終於占據喀布爾，開闢了莫臥兒(Moghul)帝國的基礎。

關於以後中亞的形勢，則因爲篇幅的關係，不可不用下述幾行來結束了。

月卽別家，以後更伸展其勢力，奪取不花刺建立不花刺汗國，又建乞瓦(Khiva)汗國。這兩個汗國互相鬥爭，十九世紀後半時代，俄羅斯南下而征服他們以前，總維持了他的勢力。

天山北路的地方，於察合台汗家爲帖木兒所壓迫，而失勢之後，便爲蒙古之一部的瓦刺，即是喀爾木克(Kalmucks)部，占據此處，一時對於蒙古與明朝，都發揮了大的勢力。以後，他的一部準噶爾興盛起來了，與清相爭，高宗時，才爲清所平定，而歸於中國。

察合台汗家，其後他的系統的王，尙稱爲汗，或占據天山南路的阿克蘇，或是喀什噶爾；但其固沒有表示出顯著的勢力，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是很難闡明其消息的。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準噶爾部的勢力，也達到天山南路，直到清高宗平定此地之時。

第十二章 中亞與希臘文明

伊蘭民族，發祥於中亞的某個地點，漸次擴展到塞利，大夏的吧！——這種學說在第二章已經論述了，是應該可以承認的。可是這個伊蘭民族，本來作爲他的信仰，而崇拜自然界中的要素，常常從清潔自然界，不能污穢之的觀念出發，制定諸種精細的宗教的戒律。所以各種的存在，例如動物，也區分出清靜與不清靜，生出清靜的保護之，不清靜的滅除之的嚴重底戒律，終於進而出現了以自然界的二元的存在爲中心觀念的祆教。

伊蘭人進入塞利，大夏地方以前，在此居住的民族之間，盛行崇拜女神 *Anaitis*，（或稱 *Anahita*，在波斯呼爲 *Tane*）的便是。這位女神，作爲幸福繁榮的神，從古時起，就在這個地方的遊牧民之間，普遍地得到信仰了，前述亞瑞（Arau）發掘的結果，中也可以看出在悠遠的時代，已經有了這種信仰。在大夏，有祭祀這位女神的有名的神社，成爲遠近各方信仰的中心。祆教開始以後，這種信仰也依然繼續實行例如阿肯米尼朝的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王，也是他的歸依者，而爲人所知悉。但是，這總是一種民間信仰，古代起已經實行的東西的遺存，作爲具體形的伊蘭人的宗教來講，自然非推祆教不可。

祆教在大夏不用說，就在塞利也在伊蘭人之間，成爲牢固不可拔的信仰；但是亞歷山大侵入此地，每當各方的征戰，得到勝利之時，便祭祀希臘人崇拜的神，而祝福勝利。在此最先作

爲有興味的問題，而應該承認的事實，是這位英雄對於祆教，採取怎樣的態度呢？換而言之，是由於這種侵入，而最先衝突的兩種文明，表示出怎樣的角度的接衝底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似乎被亞歷山大案外輕快地處置了，對此毫無躊躇地採取壓迫的態度，最先將那祆教中，以爲神聖的葬法——曝露死者的遺骸，任鳥啄吸的風習，作爲最可忌的陋習，而嚴禁了，不客氣地演出，掠奪神祠，破壞宗典等等瀆污其神聖的行爲。這樣的態度，招致伊蘭人的激烈的反感，成爲呪咀之的，是當然的。亞歷山大容易地奪取大夏之後，馬上侵入塞利，在此他遭遇到東征以來，未曾經驗過的惡戰苦鬥，卽是由於：這個地方的伊蘭人的民族的敵愾心，與唆起其宗教的反感底結果。唯這種反感，敵愾心，結局都不外屈服於馬其頓的武力之前而已；但是，作爲民族宗教而根深蒂固的祆教的信仰，固不是因此一擊，而可以歸於衰亡的，此後也依然作爲這個地方的伊蘭民族的信仰中心而存在。

亞歷山大的理想，是實現所謂希臘文明，建設站在希臘文明之上的世界帝國。所以他的侵略不是單純的一陣暴風雨，是想將其征服的地方，永久集固在希臘勢力之下，使之同化於希臘文明的，自己故意娶阿肯米尼王族的女，勦將士倣效之與伊蘭人結婚，可以說是方便這種理想的完成的。因而亞歷山大，在一切的事情方面，都想將希臘的勢力，發揮於這個地方，他的後繼者，不用說也是踏襲同一方針的。換言之，以大夏開始，爲其下屬的地方長官底支配者，一切都任命希臘人，流通的貨幣，完全用希臘式的，政治上，商業上，都使用希臘語似的，一

切都放在希臘的勢力之下，使人想到：伊蘭民族的生存的方法，除去呼吸希臘文明以外，是不能求得的。但是這樣的方針，真的可以得到所期的根本希臘化之果實與否，則非更加深入地觀察之不可。

別的民族侵入某個國家，某個地方，而想澈底破壞原住民族在那個國家地方發達起來的文化，重種新的文化以代之，不用說是至難的事實。希臘人試行的這種至難的事業之失敗，最先因安息的獨立，而踏出他的第一步。這種離反獨立，是安息人對於希臘人的人種的憎惡，是對於想葬送一切安息文化的希臘文明的反抗之表現，這是已經屢講過的。帶奧多塔斯 (Theodotus) 在大夏的獨立，與此不同，不過是希臘人之間的一種革命而已，希臘人的支配，依然在那裏繼續着；但是安息文化的希臘化，到底在實質上沒有奏效底事實，依據這個安息的例子，也容易類推出來的。表示當時大夏的文化底遺物，幾乎完全沒有存在，現在的情形，僅僅由其遺存的貨幣，來想像他的文化而已。但是以這種貨幣爲材料來考察之時，也有人以爲這種貨幣全然是希臘的，所以很可證明希臘文明在這裏實行了的事實。可是這種事實完全不能成爲一種材料來證明下述問題——當時這個地方的支配者——比較少數的希臘人爲着使這種貨幣流通於他們之間，兼之以權力使之流通於其支配下的土人之間而製造的，所以土著人的文化，真的像這種貨幣所表示的一樣，爲純希臘式所同化與否的問題。換言之，即是這樣的材料，雖可表示出占據大夏的希臘人的文明，但除此以外，不是傳述大夏的文化底資料。唯狄麥多流經略興都

庫什的南方以後，那個地方的貨幣，可以認出兩種文明調和的痕跡，這是從來貨幣學者的主張。我以為：這是由於：此時希臘人的嶺南經略，必要保存其地的文化，出於與此文化相調和的態度之故吧！然而這種貨幣，於幼克拉替德斯以後，因為到了末期，尙逐漸失去希臘的工夫與樣式，土人工藝家的技術代此而興，重量與銘文都是印度式的，對譯的希臘銘文之中，也有所發生謬誤的狀態。這即表示出：一時為希臘勢力所壓迫而雖伏的文明，乘此勢力的減退，而再行抬頭，漸次驅逐希臘文明的事實，不是證明後者的同化作用的普遍。

自從以希臘文明為理想，而從事東方經略的亞歷山大以來，希臘人占有大夏的政權，約略經過二世紀的長時期，反之證明希臘文明影響於此地的資料却沒有存在，毋寧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但是以大夏的遺跡——現今的巴里黑 (Barik) 為中心的考古學的發掘，雖然曾經舉行數次，但是沒有得到什麼成績，所以其後絕望而沒有從事此事的人，因此尚不一定可以保證其資料的不存在，然而從下述的事實——希臘政權長期存在的事實考察起來，則到今日止，已經多少發見有希臘語的刻文美術品，與其他類似這些的資料，我以為是當然的；然而這些是不存在的，所以非說為不可思議的不可。或者有人說：當時這個地方的希臘人，不外是單純的戰士冒險家而已，幾乎與文明方面沒有關係，所以連一片的刻文，都沒有殘留下來。——這種見解，是不能同意的。與這種見解相對立的解釋，不可不舉出二一，這個地方的地質氣候等等，不適於遺物的保存；二，大夏人的建築材料是生磚，與木材，因為沒有適於彫刻的材料之故，所以

這些美術，沒有十分發達，而其存在的東西，又被人不留痕跡地破壞了吧！三：現在的情形，發掘尚未普遍實行於各地方等等。雖然如此，但是到現在止，幾乎尚未發見證明希臘文明，或希臘文明，對於此地發生的影響底材料，則不得不表示驚異。

本來大夏人的反希臘精神，似乎相當強盛，那位幼克拉替德斯王被殺的原因，也有人以為是因為他偏重希臘的風習，而且誇耀其與塞琉息家的血緣之故；若果真是這樣，則可以理解，下述的事情：——當時大夏人的反希臘精神，是如何地旺盛，希臘人而且是幼克拉替德斯的兒子底阿坡羅多達殺其父親的宣言中，說其不是殺父，而是殺了公衆的敵人。由此觀之，曾為亞歷山大所獎勵的與伊蘭人的結婚政略，我以為已經招致出與他們所預期的相反的結果；到末期，這個地方的希臘人，因為這種結婚，而不能保持其種族的純潔，反而為數量上佔多數，努力脫離希臘人的支配底土人，所吸收所同化了吧！這是因為紀元前一二八年頃，張騫來到此地之時，是希臘人的大夏王國滅亡後不久的時候，然而依據他的報告，則希臘的特徵，幾乎完全沒有，說其風俗，與大宛相同，兵弱而怕戰，善於買賣；其次從大宛西行到安息國，言語頗為不同，但是大體同俗，言語相通，沒有絲與漆，不知道鑄造鐵器。作為這個地方的人的特性，而可以舉出其缺乏武勇，善於買賣，言語則附近諸國不同而相通，技術則不知鑄造鐵器各點，是不能作為引自不久以前離開此地的希臘人的系統，或為其文明所長育的特徵而承認的。這樣的狀態，不是十年二十年之間急急地表現出來的，可以解釋做是因為：這個地方的希臘人，在

其以前已經被吸收同化於大夏人之中，失去了他的特性之故吧！若果希臘文明，深刻地影響到這個地方的話，則關於他的風俗，美術，文獻，言語的特徵，必為張騫所傳述；其次，因其後交通發達後的相互往來也可以認知的，一定有記載傳留下來，然而從這些東西都不存在的事實看來，則當然可以看出這個地方的希臘文明化，依然是不顯著的。但是周到地可以附加的是：雖作如是觀，可是如前所述，在希臘政權之下，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他的文明，在某種程度以內，影響到此地了吧底事實，不拘遺物之有無，與書籍之存否，當然是非承認不可的，更不用再說了。唯不能使希臘文明成果，顯著地結實於這個地方乃是不可爭論的事實。

第十三章 窯利人與商業

包含撒馬爾罕與不花刺的，窯利一帶地方的肥沃，從古時起，就很爲人所知道；但是更非注意不可的，是這個地方，往古以來商業的發達，都市的繁榮，實是由於這種商業的發達所招致的。窯利商人的商業天才，也可以說是先天的，他的敏捷，勤勉，規模之雄大等等，有的是值得驚嘆的。會這樣發達，不可不承認其大有關於地理上的位置。有如翻開地圖，而容易知道的一樣，窯利，尤其是撒馬爾罕的位置，東方則由天山南路或北路而通中國；南則到阿富汗，印度；西則到波斯；西北是通歐洲的中心地，這些國家互相往來之時，最普通的道路，是經過這個地方，因而跟著交通的發達，各國的產物，集散於此地，乃當然之勢，中國北魏書西域傳康國——撒馬爾罕條，記述這種情形說：「諸夷交易，多湊集其國。」使那密水（*Sangsham*）谷地人民，從古就從事大規模的世界的商業，非認出其具有大的理由不可。但是這種商業，不用說，是用隊商來經營的，是多數的人，成爲一種團體，而往來於遠隔之地的，因而除去商品的運搬以外，也成爲使各種文明互相傳播的偶然的機關，其次以傳播文明爲直接目的的人，也是得到他的援助，才比較容易從事於難途的旅行。因而他們行商的範圍越擴大，則文明互相傳播的範圍也越大，他們的商業發達史，馬上可以作爲他的文明傳播史，這是一一的事實，可以證明出來的。但是隊商的往來，固不是窯利人的獨佔事業，各國的商人，也同樣從事於這種

買賣，例如中國的隊商，不用說從漢代起，就已經遠賈於西方了，但是隊商之中，最顯著的，看做是塞利人，是沒有錯的。在此特別就塞利的商業，而加以敘述者，不外是因為一方面，其自身是一個應該注意的文化現象之故，同時，他方面，因為這種關係，他們的位置，作為塞利文明傳播者來講，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之故。

紀元前二世紀的時代，張騫訪問此地之時，早就看出；這個地方的人的特徵，是擅長於買賣，這已經有如前章敘述的一樣。自然這個時代，塞利（康居）的商人尚未有直接往來於中國的，但是，跟着張騫以後，中國的事情，實際上漸次為西方所知道，他們早就為着直接貿易之故，將其商路，遠拓於中國了。前漢時代的記錄，散見着康居國朝貢於漢室的事實，其中無疑的一定有這些塞利的商人。一九〇七年，斯泰因（Stein）氏，從天山南路的羅布泊（蒲昌海）之南，漢之烽台的遺跡，發見了：認為紀元一世紀時代的東西底一片塞利文的商業文書，實際上這不可不說是證明上述事實的最古的史料。後漢時代以後，塞利的名字，顯然記於中國的史籍之中，粟弋（後漢書西域傳中，有粟弋我以為是這個粟弋之誤）與粟特，另外還有記述康國的，說其地的使者來貢，即是說為貿易而來。五胡十六國時代，多數塞利的商人，來到現今甘肅省的涼州。——關於此事，魏書粟特國條記著：「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藏，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

關於塞利地方的人民，主要是從事於商業的事實，此外還有種種有趣的記錄。例如隋代

韋節的西蕃記中，便說：康國——撒馬爾罕的人，皆長於商賈，男子五歲便讀書，稍懂便學習商賈，以得利多者爲善；唐會要記述康國的地方便有：在康國一生子，便食之以蜜，手中握之以膠，這是希望其子長大之時，口中常操甘言。持錢恰如膠之粘手。他們在習慣上是長於買賣，爭求分銖之利。男子二十，便爲商賈而出任於他國，這些人，也有來中國的，凡利之所存，在，其足跡無有不到。同樣的記事，此外在各種的書籍中，也看得見，尤其是廣行商於各方，很爲人所知，隋煬帝時，曾集合西域的商人，聽取各國的事情，例如著西域圖記的有名的裴矩，也傳述出：這個地方的商賈，廣經諸方，遍知各國的事情的意旨。其實，他們追逐商利而週遊的地方，範圍廣汎，波斯與東歐不用說，三世紀時，更南入印度，而遠及交趾，中國的南北不及說，連內外蒙古地方，也盛行出入。不問開明之國，與未開之地，到處都尋找利源，掌握商機，無遺憾地發揮其從幼年訓練起來的鍛腕，而從事利得的收穫。例如古據中國北方的慄悍而無知的遊牧民，似乎也是他們最重視的顧客之一，他們拚命掠奪蒐集得來的中國的財貨，巧妙地爲這些商人的狡智所奪去。以隋唐時代的事情，爲根基而考察之時，則從隋唐以前的時代起，在那不停的北人南侵的裏面，常常潛伏着長於這種狡智的塞利人，而煽動他們的南侵，我想幾乎是無容疑義的事實吧！

如是，作爲伴隨塞利人的商業的遠征，而發生的事件之一，非加以注意不可的，是他們在其足跡所到之處，形成多大小殖民地的事實。在路途之中，有由同胞組成的城邑這件事實，

對於長年往復於同一通路的他們，從各方面講起來，無可疑地，是他們所希望的。因而他們由於自己的意思，應該在適當的地點，開設其殖民地；是當然的；此外，因為偶然的事情——例如關於前述涼州窣利人看得見的事情，或不能遠歸本國的，或不願歸還本國的，或乘某地的防禦薄弱而占據之等等的事情，——而在其所在之地，形成殖民的集團，也是可以推想出來的事實。依據今日的文獻，則可以知道：在天山南北兩路，他們往來的沿途的各地方，從隋唐時代起，就有了這樣的殖民地；但是事實上，或者更要遠溯到隋唐以前，也未可知；其次不單這些地方有其殖民地，恐怕其他地方也有吧！

窣利人的商業活動，是這樣旺盛，所以撒馬爾罕暨窣利一帶的市場，極其富厚，是當然的，阿拉伯人侵入之時，不單撒馬爾罕，與不花刺誇耀其繁榮，就 Baykand Kushaniya 與其他的市場，也誇耀其繁榮。因而這些地方有幾多的大富豪，而這些富豪，具有廣大的土地，住在嚴然的城廓內，作爲貴族——占有和各地方的支配者一樣的位置底貴族，而存在。後來，這個地方，各種商業組合的制度，發達起來了，個人獨占的行爲似乎也爲人所限制；但是阿拉伯人侵入以前的時代，這種制度尙未發達，完全呈顯出富商王國之觀，在其四隣的薄貧而武勇民族，對於這樣殷富的窣利，當然沒有拱手旁觀之理。前面所述，無數次的北族之入寇，與阿拉伯人之侵略，即是希望這種富厚的，據說有時一舉而竭盡其富。這種關係，是窣利人的商略與四隣的武略之抗爭，前者用由「蜜與膠」而可以祝福的狡猾手段，在窣利的谷地間搜集了的財

貨，馬上被後者用可怕的武力奪去了，但是被搶去的財富，又在平和裏，歸於前者的掌中，這種光景是跟着時間的經過，而不斷地反覆着的。

要之，當中亞史的曙光時代，可以認為不可羈束的伊蘭民族精神的橫溢底率利人，大概也因為以後由於北方民族不斷的侵入而受到壓迫之故吧，利用其自然的地理的形勢，而成為廣汎地從事世界商業的民族，甚至於可以說：凡是有利之處，便印有他們的足跡，出入於當時的世界之各方。

第十四章 窪利語及天山南路使用的諸語

言語的運命，是非常脆弱的。關於我們以爲：這樣廣闊地週遊世界，而到處傳授其言語的窪利人，他們所操的窪利語，是怎樣的言語呢？這也在完全不得而知的情態中。他們的言語，和那曾經使用於天山南路的西域諸國，而一樣地絕滅了的各種語言，今日再爲人所知道，是由於前世紀末葉以來，各國的學徒在天山南路地方舉行的探檢，與一般學者努力從事其所蒐集的資料的研究。現在非先極其簡單地記述這種探檢事業的經過不可。

天山南路這個地域，中央橫亘着流沙的沙漠，有如其名之所示，沙漠的沙，向其緣邊擴大，淹埋了人的住地，所以漢代計有三十六國與五十餘國的各國，今日多被埋在沙漠底下。但是這個地方空氣乾燥而降雨少，所以一旦被埋藏於沙中的東西，不容易損壞，由此而言，可以說這些國家藏在很好的貯藏處之中。如是埋藏的東西屢屢有因偶然的機會，或爲打算得到財貨的發掘者所發見的場合。可是，從前世紀之中葉起，在歐洲的東洋學界，爲着研究東西文明交涉的足跡之故，對於研究這個地方——兩者交通的徑路——的文化底事實，下以熱心的注意，努力獲得其研究的資料。如是，如上的出土品，老早就由到此地的基督教宣教師等之手，介紹於歐洲，喚起學者深刻的興味與注意。其中最刺戟學界的，是一八九〇年，英國的寶厄(Bower)大尉，訪問埋藏於庫車——古之龜茲西方的佛塔，而從土人那裏得到其中出土的古書

籍底事件。寶厄將此古書，寄給在印度的英國學者霍恩爾（Hoernle）而知道那是很古的書籍，更寄到歐洲研究的結果，知道這是五世紀中葉書寫的藥法書，及其以前的佛典，使學者吃了一驚。不久出自南方和闐地方的寫在桦皮與紙上的古寫經，文書，古錢，土偶，陶磁器等等，又被學界所介紹，承認其都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資料，這種多數被埋藏起來的資料，更為人所注目了。在此前後，歐洲的學者有幾位為着研究各種的學術，親自來到此地，更進一步，脫離了從土人手中購置這些資料的狀態，自己開始着手於發掘採集，同時依據其報告，知道埋藏這種遺物的遺跡，很多。在此，早先熱心獲得資料的學界，為着實現他的希望之故，痛切地感到：有在完全的組織之下，派遣探檢隊到這個地方的必要，遂於一八九九年，關於羅馬的國際東洋學會上，由俄國的刺得羅夫（Radloff）教授提議：組織國際中亞及遠東探檢協會；接着於一九〇二年在漢堡開會的東洋學會中，宣告成立，由於領土的關係，便宜上將總部設於俄國，支部設於協贊的各國，協力從事於這種事業。但是刺戟這個協會成立的，我們不可不知道：下述兩種事實——前世紀末葉，俄國及芬蘭的探檢隊，入外蒙古，獲得古代突厥民族與蒙古民族殘留下來的貴重資料，得到大的功績；及一九〇〇年斯泰因氏早就在和闐地方試行學術的大規模的探檢發掘，得了驚異的結果這兩種事實。

於是協會成立以後，歐洲各國的探檢隊，用競走的姿勢，派遣到這個地方。即是：前述的斯泰因氏，已經於一九〇〇年試行其第一回的探檢，繼續實行到三回；（聽說氏又於數年前從

事第四回的西域探檢，因為這個地方的政情關係，沒有什麼所得而回去了。）德國派遣格楞威得爾(Grunwedel)氏，勒柯克(Lé Coq)氏等等，法蘭西派遣伯希和(Pelliot)氏，俄國派遣鄂爾敦堡(Oldenburg)氏暨其他諸氏，日本於一九〇二年，派遣大谷光瑞氏以來，繼續派出堀，渡邊，橋，野村，吉川，諸氏，從一九二七年起，更有瑞典的海定(Hedin)氏與中國的學者相協力，從事於此處的探檢發掘。這樣各國的學者陸續跑到此地，冒所有的艱苦，為學術而奮鬥的情形，實在非說為現世紀的學界的一大偉觀不可。他的結果，於探知古代此地的文化上，豐富地搜集了有力的資料，那些研究的成果，也繼續發表了，在此，西域史的研究，便表示出劃期的進步。在此想敘述的窣利語，和那曾經完全埋葬於不明裏的諸語的智識，至於復活，也完全是這種事業所得的惠澤。

各國中亞探檢隊獲得的多數文書之中，用當時完全不明的言語書寫的有三種類。其中的一種，是從探檢區域的各方發見出來的，使人認知其是廣汎地沿西域交通路而使用的。歐洲各國的學者，競事研究，終於發見出：文書中記述的月名，與十一世紀的著者阿爾·俾爾尼(Ar-Biruni)遺留下來的窣利語的月名，相一致的事實，可以決定這是窣利人使用的言語。原來窣利與窣利人的名稱，如前所述，從中亞史的曙光時代起，就為人所知道，但是他的言語上的特徵，殆無所傳，古時斯特拉奔說：窣利及波斯北東地方的人，講同一的言語，以後玄奘三藏關於窣利的言語文字，只在其西域記中，殘留着僅少的記事而已，一向不得要領；但是這麼一

來，用其言語著述的各種宗典，日用文書，曆，碑文之類，也爲人所知道，時代講起來，則如前所述，可以追溯到紀元一世紀時代；作爲場所講起來，則不獨天山南路地方，還普及到從甘肅省燉煌地方，至外蒙古地方底事實，也明瞭了。換而言之，這些發見，不可不看做一種東西，用來證明：凡是窣利人所至的地方，便是多少講說窣利語之地。這種事實，從窣利文明的傳播上來講，也是非重視不可的，例如各種宗典便有不少是從這種窣利語的東西，譯爲東方語言，至少譯爲中國語言的。

第二種的不明語，主要的是在現今的和闐——于闐地域出現的文書中看出來的，這些也是典籍與日常的用語，知道其是於突厥民族侵入以前，在那個地方使用的。從這一點講起來，所以有的學者稱此爲于闐語——和闐語；其次那種言語的性質，是屬於伊蘭語的一種，所以有人從這一點出發，稱之爲東方伊蘭語。可是雖然一樣說是伊蘭語，但是這種言語與那窣利語相比較，則有人說其原始的特徵，顯然崩壞了，或者認爲與中國所謂大月氏——貴霜的言語相類似。無論那一種主張，總之，這樣知道于闐人使用的言語，而且明白地闡明其言語的屬性，乃是顯著的事實，更將這些與那表示其人種的特徵的記事和繪畫之類相參照，也可以在此決定于闐人是屬於伊蘭人種的。

第三種的不明語，在方言上，可以分爲 A B 兩種，兩者都是從古時的疏勒，龜茲，焉耆，高昌等處——所謂沿北道的地方，發見出他的資料；但是應該注意的，是一，A 種的不明語，

在古昔的龜茲的領域——今日的庫車附近，絕對看不見，同時，用這種言語書寫的東西，只限於佛教的典籍；及二，B種的不明語，廣布於北道各方，同時顯然是用爲日用語的，在通行的免狀與壁畫的銘文中也有使用。這些不明語，應該稱爲什麼言語呢？這是不容易決定的。在那同是由這個地方的探檢而得到的古突厥文的彌勒下生經的跋文中，發見出那些有的是從印度的言語，譯爲兜法勒(Texi)——吐火羅語的，從吐火羅語譯爲突厥語的，所以這種不明語，是當於此地所謂的吐火羅語底學說的主張變爲有力了，其後，更依據研究的進步，而知道：突厥語的彌勒下生經之中，雜有這種不明語，或爲這種不明語的特徵所同化的梵語。將這和前記跋文中看得見的言語相合照而觀察的結果，則顯然非將這種言語，稱爲吐火羅語不可了。但是這種不明語的A，B，兩種之間，一方面說是方言，一方面也有相當顯著的不同，他的分布狀態與使用的目的上，也有差異，所以關於兩者都可以稱爲吐火羅語呢？還是限於一種才可以稱爲吐火羅語呢？這也是有議論的；但是，現在我以爲只可以用這種名稱，來稱呼A種的不明語；關於B種，則依據種種的證據，最近將其呼爲龜茲語，顯然是妥當的。但是我以爲是以今日的庫車——古時的龜茲爲中心而使用的言語，所以可以稱爲庫車語的學說，以前也爲人所主張，現在，從別的立場來講，這個名詞，我以爲是適當的。

第三的不明語，就是這樣決定的，他的B種，最遲從一世紀之頃起，就是以龜茲爲中心的北道地方的人民底日常語，是沒有疑問的；然則A種的吐火羅語，是那一種人使用的呢？爲什

麼使用這種語的資料，沒有從龜茲的領域出土呢？——關於這樣的問題，尙未得到滿足的說明。但是吐火羅語的名稱，是不可動搖的，那麼這種語言，畢竟是關係到吐火羅的地方與人種，是無可疑的。唯，這些是與斯特拉奔等記述的古吐火羅的名字發生關係呢？或者是關係到我們以爲是屬於這個資料的時代底唐代之頃的吐火羅呢？這種疑問，尙殘留於將來。

此外關於這種言語的重要問題，是他的性質。這一種言語，也是屬於印歐語的一種底事實，老早就弄明白了，而且他的音韻法，不是像前面的塞利語與東方伊蘭語一樣，屬於其中的東方系，反而類似西方系的歐洲語，單語中，也可認出其有同樣的類似的特徵。這種現象，應該怎樣說明呢？這尙諸說紛紜，未有一定。無論附以怎樣的說明，總之，這種類的言語，是在此地使用的，乃是不能動搖的事實，是可以重新認知的事件，使用這種言語的龜茲地方的人種的風貌，就從此地發見出來的繪畫來講，也是可以認識的，依然有如言語的屬性表示的一樣，那，無疑地不是突厥種族，而是屬於雅利安種之一。

天山南路的西域諸國的古代住民，是怎樣的人種呢？——這個問題，已經議論得很久，而不容易決定。何況他們是使用怎樣的言語，具有怎樣的文獻呢？——關於這樣的事實，幾乎是完全在不得而知的闇黑狀態中；將這種不明瞭的東西，這樣地解明出來，則不可不說是解決了中亞文化史上極其重大的問題。

第十五章 中亞的諸宗教與其典籍

甲 祜教

在大夏開宗的瑣羅亞斯德教——祆教，可以說是：得到阿肯米尼朝的保護而急速地在伊蘭民族之間，博得信仰的，在其聖典贊得亞味斯塔經(Zand Avesta)之中，記載塞利，Margiana 大夏，Hyrcania 及拔汗那等等，是信奉祆教的宗徒的住址，據此可以想出：這種宗教，從遠古之時起，就已經傳到媯水彼岸地方的伊蘭民族之間了。唯，聖典之中的記事，關於其時代與事實之真偽，很多需要批判的研究，所以在什麼程度以內，可以依據聖典呢？則不免意見紛歧；但是從各種事情考察起來，則祆教傳到塞利地方是開教後不久的時代，是沒有異議的，唯其後，祆教完成了怎樣的發展呢？因為這個地方的文獻普通都湮滅而無傳的關係，所以幾乎完全不得而知。回教徒侵入此地，殘留種種記錄以前的事實，只有從零細地散見於中國書籍上的地方來推知以外，是沒有方法的。

中國的史料，關於祆教的記載，在五世紀之半頃，才開始出現。以當時奉南北朝的魏之使命而赴西方的董琬高明等等的見聞爲材料而記述的魏書西域傳的康國——撒馬爾罕條下說：決定住民之刑罰的法律，被放在祆教的祠中，斷罪之時，依此而裁定之。所謂祆，是瑣羅亞斯德教，祭天神火神的，這個字是爲着表現這種宗教之故，在唐初才製作的新文字，不外是指瑣

羅亞斯德教的而已。當時佛教已經通行於此地了，如此依據放在祆祠中的法律來斷定住民的罪惡——由此而觀，則可以推測出：這種宗教已爲一般所信仰，斷罪的風習也由神意來決定，而無錯誤吧！其次，依據六三〇年頃訪問此地的玄奘三藏的記載，則知道：當時的佛教，完全衰滅了，只有通行祆教；其後約經百年，同樣遊歷此地的慧超的記載中，也明記：撒馬爾罕暨其附近諸國，都是信奉祆教的事實，回教徒侵入當時，不花刺與察利諸市，信奉祆教的徵證，在其各種的記錄中，可以看見；此外七世紀的不花刺（布哈）與花刺子模（火尋）的貨幣上，有鑄有戴冠的像，與燃起聖火的祭壇都表示出是信仰祆教的，和中國史料的傳述相一致。這種冠稱爲 *Tagi* 是祆教徒使用的，因而將祆教徒呼爲 *Tagi*。然而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後，因爲兩者混淆而不明瞭，所以回教徒也用此名稱呼阿拉伯，這傳到中國，遂以大食、大石等等文字，來稱呼阿拉伯人了。

如是這種宗教，自開始以來，到回教隆盛之時止，是繼續實行於察利地方的，然而在此沒有特別得到國教的位置，如下所述，與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相並列，不妨害自由的信仰。因而祆教與政權之間沒有什麼連繫，其旨趣完全如波斯的政教兩權一致的情形不同。我以為此地是各個異民族屢屢侵入，掌握其主權，而且大商輩出，得到貴族的地位底地方，所以雖是同個宗教，但也不至於像在波斯本國一樣，完成了作爲國教的發達吧！

可是，欲知道這種宗教，怎樣從察利地方，傳布於東方，或東北方的中亞，也依然非主要

地依據中國的記錄不可。依據中國的記錄，可以知道：占據這個地方的嚙噠族是信奉祆教的，同時也可以知道：南北朝的魏之時代，也傳布於天山南路的焉耆，高昌地方，從魏到周齊時代，已經傳入中國了。我以為恐怕是由東來的窣利人，傳布於這些地方的，在中國，則作為他們的懷柔策之一，而加以保護的。其後，跟着時代的降落，關於祆教流行的記事，逐漸增多，至唐代可以知道：也從西突厥，疏勒，于闐，伊吾，——今之哈密，燉煌附近傳及長安洛陽，建立了他的神祠。

乙 佛教

阿育王時代佛教已經廣布於印度國外，是佛典中傳述的有名的事件。關於此外的確實史料，欲尋求佛教，最初傳布於北越興都庫什山脈的地方底痕跡，則可以遠遡到：紀元前一世紀中葉著述玻利斯忒（Alexander Polyhistor）的記事中，有當時大夏語的沙門（Samane），這個「沙門」，是前述龜茲語的西域文書中看得見的 Samane，吐火羅語與窣利語的 Saman，證明佛陀的沙門，此時已在大夏。佛教更於什麼時候傳到窣利呢？這固然是不能知道的，但是關於下述的摩尼（Mani）教是二百二十年代以前傳入此地底事實，則有可以根據的記錄，此外根據佛教傳入中國的事情，也可以確定的。那是因為知道：這個時代以前，來中國宣佈佛教的僧人之中，有康居的佛僧居臣（或是臣）康孟祥，康僧鎧等等，都於二世紀之末到三世紀的中葉之間，活動於漢魏的佛教界之故。若果與下述的事實——在此以前已經有名的安息國的太子安世

昌成爲佛僧，於二世紀中葉，後漢桓帝之時，來中國從事譯經，其後，這個國家的僧侶便有相繼來中國傳道底事實，合而觀之，則其東隣的窣利也同樣早就傳有佛教。這三位佛僧，當然非看做在其本國修了佛道，乘當時佛教東傳的風氣而來中國的不可。當時中國史書所謂的康居，也是掩有窣利的，所以稱爲康居人的之中也包含有窣利人，而這些作爲康居的名僧而出名的人們，與其看做過遊牧生活的純粹的康居人，那就不如看做屬於康居的窣利人要爲適當。

總之，紀元前一世紀之半，在大夏有佛教已經施行的記錄，在窣利則近二世紀之末之時，方可以看出来使人推知其流傳的史料，但是實在講起來，當然是與安息所行的一樣，在其以後，就已經傳到這裏來了。這顯然從南北朝，通過隋代而繼續爲人所信奉。七世紀之初，陷於衰亡的狀態中，這種事實，如前所述，依據玄奘的敘述也是可以知道的。

佛教從什麼時候起，施行於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呢？這也沒有確實的證據。但是三世紀的中葉，龜茲人到魏而從事佛典的漢譯，魏之人，去于闐，求取大乘經典的事實等等，是可以知道的；又從下述的事實——漢譯的最古時代的經典中，用有可以認爲龜茲語的音譯或義譯的文字底事實考察起來，則這些漢譯佛典完成以前，即是在二世紀以前，在這個地方，已經有佛教了。當西方文明東傳之際，傳到中國以前，應該先傳到此地底事實除去極其特殊的場合以外，普通當然非承認不可，這種情形不是單獨限於佛教流傳的場合。龜茲，于闐之外，疏勒，焉耆等地與這個地域以內，信奉佛教之地，可知其數很多，但是依據各種徵證與一般的意見之時，

則這個地方的人民，普通是信奉佛教，看做是一世紀時代的事實，殆是無誤的見解。

於是，早就見到其流傳的天山南路的西域的佛教，繼續流行到回教在此地流行以前，大體沿北道的地方，信奉小乘教，沿南道的地方，信奉大乘教，產出幾多的俊髦，尤其是羅什三藏，表示出東方佛教界的大活動，是周知的事實。

丙 摩尼教

所謂摩尼教，是波斯的薩珊朝的初期（始於二四〇年頃）出的摩尼（Mani）以古代巴比倫的宗教爲根基，其中斟酌瑣羅亞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等等的教義而開創的新宗教，是徹底的二元教。一時曾爲這個王朝所承認，宮廷內也有了他的信徒，但是不久，便被拜火教，作爲異端者，禁絕人信仰，教祖摩尼於二七五年頃（根據西域文書，則二七三年的主張也可以成立）被處磔刑，經典也被燒掉了。據說摩尼在世之時，曾派遣其子弟一人到東方，在 Seythian 民族之中布教，但是確實的事實，不知道。摩尼一被處刑，教徒一被迫害，他們大多逃於東方，移住於媯水彼岸的各地方。這最初確實傳述出摩尼教的流入此地，是伴着教徒之逃避迫害底移住而發生的事實。這種移住我以爲不單在窣利諸市，而且越過藥殺水而及到碎葉川那邊，因而可以知道：最初將伊蘭文化移植於此地的，便是他們。總之，此後的花刺子模與窣利兩地便這樣地成爲摩尼教的本地，佛教老早就傳入祆教實行的地方，在那裏又傳入此教，如是三教相並而行。回教侵入以後，摩尼教尚在此地久保其命脈，他的一派，從其信仰上，信奉共產主義，

甚至於共有婦女，是有名的事實。

摩尼教更從碎葉川地方東漸而至天山南路的西域，是摩尼教傳入中國的武則天延載元年（六九四）以前的事實，依據今日敦煌出土的一篇文書之所示則可知，數年前羅布泊南方石城鎮的首領，是撒馬爾罕出身的摩尼教的僧侶。傳入唐朝的摩尼教，更傳入與唐有密切關係的回鶻，在現今外蒙古地方博得其部人之熱心的信仰，他的僧侶，甚至於擔任國政的指導。本來這個地方的突厥民族的本來的宗教，是所謂薩曠教，例如佛教，也有爲人所宣傳，又有某個可汗想信奉佛教的，但是在下述的——與其好戰勇武的精神不相容的理由之下，終於不見流傳。但是，殺生禁斷的戒律，相當嚴重的摩尼教，會這樣在他們之間，得到被信仰的勢力，毋寧非說爲奇怪不可。摩尼教僧侶從事於東方的布教，不獨是窣利地方的人，也有吐火羅人，有如單從下述的事實，——在回鶻的都城鄂爾坤(Orkhan)河畔的哈喇巴爾迦遜(Kara Balgassun 黑虎城)，建有用漢文，窣利文與回鶻文書寫的可汗的建功碑底事實，可以推知的一樣，到此地來的摩尼僧之中，無疑地窣利人是不少的，在排斥佛教的突厥民族之間，完成了這樣的成功，是可以首肯爲這個慧敏的民族的。

回鶻部移住於天山南路以前，在其一部分的地方，已經信奉摩尼教了，關於這種事實，除去前述的證據以外，還有別的證據，在其移住以後，以他們的信仰爲中心，不用說摩尼教更廣布於這個地域了。十世紀中葉，作爲摩尼教徒的 Toghuszghuz，而爲回教徒史家所知道的，不

外指移住後的回鶻部族。

丁 基督教

基督教流傳於塞利地方之可以確實的，是比較其他各宗教遲得多的時代。從五世紀之初起，木鹿(Merse)的也里(Here)，設置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的司教，這種事實，是各種書上看得到的。但是七世紀的前半以前，越過嫣水的地方，沒有記載其任命僧官的記錄。在基督教中，關於任命各種僧官的記錄，比較有保存，由此大概可以知道其布教的範圍與時代；由此觀之，則基督教在塞利地方的流傳，當然是七世紀前半薩珊朝滅亡以後的事實。但是因為公開任命僧正，大僧正等等僧官，以管理那個地方的教區，所以在其以前，已經在某種程度以內，信奉基督教，可以想到是當然的事實；同時，有如中國有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文字，證明的一樣，唐貞觀九年（六三五）已經由大秦的阿羅本傳入來了，所以作為最普通的場合，而考察起來，則我以為：當時基督教已經流傳於塞利，與其東方的西域地方了吧！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尤其是高昌故地，發現了用叙利亚語，塞利語，中世波斯語與突厥語等等書寫的基督教之福音書，教論，及其寺院的壁畫等等，便是基督教流傳此地的面影。但是遺憾的事情，是不能顯明地決定這些聖經與美術的年代，有人認為其中的某種類，非六世紀中葉的書體不可，但是尚難擔保其果然真確與否。若果可以明白地證明這是事實的話，則可以明證：此教傳入中國以前，已經傳布於高昌地方，那時已經有翻譯為塞利的言語，或用其言語來選述的經

典了，給基督教在中亞的流傳史上添加一大光明。

戊 回教

最後，關於回教的流傳，也想在此加以簡單的敘述。回教的傳入中亞，不用說是跟着阿拉伯人的侵入中亞而發生的事件；然而六七〇年頃，是阿拉伯人，作為最初越過鳩水的侵入者而有名的阿爾・哈漢(Al-Hakam)不用說，就其後經過四十年左右，討伐翠利最初將回教教主的勢力，傳植於這個地方的 Kertayba 的經略以後，阿拉伯人也不過單是軍隊的統率者，租稅的徵收者而統治此地的人民而已，不是自己擔任實際的統治。因而當時關於信仰問題，非常寬大，雖然對於改宗者加以優遇是自然的，但也不一定採取禁止其他的宗教的態度。回教，是從八世紀之半，黑衣大食朝建立以後，才發揮其排擊異教的本質。從此時起，才採取波斯薩珊朝時代實行的政治組織，使其領土的全部信奉回教，作為國教。所以此後在翠利那屢屢一因信仰問題而起鬥爭，則實行迫害。

關於這個宗教，更傳布於以東的西域底事情及時代，則不一定明確；但是普通所知道的顯著的事件，是九六〇年統治碎葉川何畔的斐羅將軍城的突厥族底波格拉(Satog Boqra)汗，與其二十萬張幕的部民一起，改宗歸依的事實。在此以前，因為移入翠利的突厥族，已經是回教徒，乃是顯然的事實，所以回教乃漸次流傳於這個地方的同族之間！總之，波格拉汗的改宗，無疑的是顯然的事實。有如第十章敘述的一樣，有不少學者將此一家，認做回鶻部族。十

一世紀中葉用突厥語著的，也可以說是回教道德書的，有名的 Kudatuk Bilik，是俸呈於這一家的王底書籍，而爲人所知道。

在疏勒與其南方的莎車等處，也於一千年代之時，信奉這個宗教了。九世紀後半，從外蒙古移住於天山南路的回鶻部族，如前所述，是熱心的摩尼教信者，似乎於十一世紀以後，才漸次爲回教所感化，在中國因爲他們是回教徒，所以稱此教爲回回教或回教。回回是稍爲訛傳回鶻的形式，回，更是他的省略的形式。如是回教漸次將其教線，擴大於中亞，終於普遍於其全部領域，幾乎成爲唯一的信仰。關於此事，以後更非詳述不可。

在此，結束這一章之際，關於中亞諸宗教的經典，非稍爲附記一下不可。關於這些宗典的知識，完全是前述西域探檢齋得的賜物，在其以前關於這些經典，幾乎是完全不得而知的。但是瑣羅亞斯德教的宗典，到今日止，尚未聽過有一片發見了的，所以依然沒有直接的方法，可以知道：在中亞實行的這種宗教，怎樣傳述其教義。

佛教的經典，在中亞各地，廣汎地爲其各地的言語所翻譯，中國的佛典中也有翻譯那些的，這種事實，若果仔細地讀起漢譯佛典來，則僅僅記有一些兒；但是實行西域探檢以前，一般人不要講，就在佛教學者之間，幾乎也沒有注意到的。然而從新得的資料而可以知道的是：如前所述，從佛教流傳的初期時代以後，各種佛典便爲窣利語，吐火羅語，龜茲語，于闐語，

後來的突厥語所翻譯，除了誦讀原本的梵語佛典以外，還各自誦讀自國言語翻譯的經典。就中稱爲吐火羅語的佛典，或是在吐火羅翻譯的佛典，輸入到天山南路的北道地方也未可知；但是用龜茲語與吐火羅語只有方言的差異而已的龜茲語書的佛典，無疑的，是翻譯爲龜茲地方的言語的。從來歐洲的學者，以爲下述的 *Kusān* —— 在突厥語的某種佛典的奧書中，有從印度的言語，譯爲 *Kusān* 的言語，由 *Kusān* 的言語譯爲突厥言語的 *Kusān*，是第七章中敘述的貴霜，以爲這種佛典是從貴霜，—— 中國所謂大月氏的言語譯爲突厥語的東西是誰也不會懷疑的；但是那是非常錯誤的，所謂 *Kusān*，實在不外是用突厥語來稱呼龜茲的名稱而已。因而所謂譯爲 *Kusān* 的言語，其意義即是譯爲龜茲語，不能像近似的吐火羅語的佛典一樣，附以下述的想像——這些是在此地以外翻譯的吧底想像。其次所謂突厥語的佛典，普通與回鶻語佛典是同一的，從言語上文字上來講都是不能區別的；但是明白地寫做譯爲突厥語的佛典，是回鶻人於九世紀中葉，移住西域以前，譯爲這個地方的突厥人的語言的，不應該將此稱爲回鶻語。

可是應該注意的是：這樣地佛典爲西方諸地所譯翻撰述，則其間，不會雜入那個地方民族的宗教思想，對原來的佛教，給以變化嗎？到今日止，發表出來的研究的結果，則尙未能認出這種顯著的現象。但是如佛之本生談的種類，這些佛典之中，載有與梵本非常異趣的東西，至少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是不可爭論的事實。若果漢譯的佛典是從這種原典上多少發生變化的佛典中譯出來的，則由東方佛教上講起來，也非下以重大的注意不可。

摩尼教的經典，和摩尼的焚殺一起，被人燒棄了，其後這種宗教在東方實行的教義，一向不明，反而只有從基督教的典籍中存錄的地方，可以知道其大體而已；在今日，發見了很多用塞利語著的摩尼的宇宙創成說，用中世波斯語，說是摩尼自己著的七部經典之一，與用回鶻語著的經典中，引用佛教經典與基督教經典，暨這些言語的福音書，讚歌，宗論等等，便可以明白地知道當時的摩尼教義。譯為漢文的摩尼教經典，也從燉煌的佛洞中出現了，對於唐代的摩尼教史上，給以光明的解答，但其原典我以為依然是塞利語的。

關於佛教的經典。則只簡單地作上面的敘述。但是用漢文著的五種，從燉煌發見了，撰述那些經典的人，大概是塞利出身的上德者，是從其用語上可以推測出來的，這是需要注意的。
在回教上，則神聖視其聖典古蘭經的言語與文字，不許教徒將此譯為那一國的言語，全部誦讀阿拉伯語阿拉伯文的古蘭經。所以不能像佛教暨其他宗教一樣，以為在其聖典上有地方的民族的變化底餘地。如是大凡是回教徒的人，多少都學習一些阿拉伯語的智識。因此我們不可不知道：這種事實，不獨是宗教，就在阿拉伯文化的傳播上，也有重大的關係。

第十六章 宗教美術

前章已經敘述了回教爲中亞全境所信奉的情形。我們知道：這個宗教，是以排擊異教，箇異教徒改宗，爲信徒的神聖的義務的，所以努力絕滅屬於異教的聖典暨一切的文獻。古來廣布於這個地域的各種宗教的文獻，歸於湮沒的原因，我以爲除去自然的敗壞以外，大部分是由於回教徒的絕滅。跟着諸宗教的流傳而盛行的美術之類，也在同一的運命之下，他的狀態，幾乎完全不得而知。獨在這個地域中，蒐集：天山南路的西域，近時實行前述的探檢發掘，破壞之手尚未及到的東西，與埋沒於地下，保存其舊態的東西，而可以闡明其大概，不可不說是一大幸事。在此爲著論述這個問題之故，應該採取圖示這些資料而論證之的方法，但是現在不依據這種方法，只試行抽象的論述就足了。

曾經流行於這個地方的各種宗教美術之中，作爲最可注目的東西，應推佛教美術，是誰也沒有異論的吧！這種重要美術的遺留，可以就今日各地的千佛洞（即是突厥語所謂的^{تۈڭىزى}）與佛塔的廢墟中殘存的繪畫塑像之類，而辨認出來。所謂千佛洞，是在山的斜面，開闢多數的洞窟，祀奉佛像，廊廓相連，以貫通洞窟相互之間，洞窟的內部，佛壇之外，以佛畫裝飾之。這種千佛洞，畢竟相當於佛教的寺院，是因爲這個地方的建築材料缺乏，而自然發達起來的性質的東西。然而我以爲一定是印度與阿富汗等處，已經發達的千佛洞，跟着佛教的傳播，而輸

入此處的。佛塔，是另外建於平地上的，這也不是木石建造的，主要的是用酒磚與泥土築成的。這些佛洞與塔，其中放有佛像及其周圍壁上，屋間屋頂等處描寫的繪畫之類，今日發現得很多；其中屬於古昔時代的東西，構造，手法，意匠，等等一切的要素，是引自所謂乾陀羅美術的系統，這不外是照樣將此移入來的而已。跟着時代的下降，便加入這個地方的好尚，現出各種的變化，其次受了中國美術的影響的東西，又表現出來了，這種變化，大體與這個地方的文明之傳播並發達史上可以認出來的潮流，相伴行。乃是興味深厚的現象。然則所謂乾陀羅美術，有怎樣的由來呢？在此非稍為論述不可。

希臘大夏朝的狄麥多流王，擴展其勢力於興都庫什的南方以來，希臘人，幾乎在兩百年之間，繼續支配了包含乾陀羅的喀布爾流域。而他們從當初起，就採取容認這個地方的文明底態度，如那位我們以為從紀元前二世紀之中葉到其末葉在世的麥喃達王，便是熱心的佛教信者。但是在這個時代，我以為尚未形成所謂乾陀羅美術。他的證據是：這位王的貨幣上，只刻有圓輪——法輪，尚未刻有後來的貨幣上看得見的佛像。若果當時已經鑄造貨幣，以像來表現佛，則當然鐫有法輪的那一面，應該彫刻佛像，一定如迦膩色迦王的貨幣上看得見的一樣。本來，這個法輪，在未用像來表現佛的時代，已經與蓮華，菩提樹，塔一起，用為佛教的象徵，是古時佛教的紀念——Sand Barbuda，等等塔上的裝飾上，可以看得見的。以佛像來表現釋尊與其從徒，實在是以乾陀羅美術為其嚆矢。

被推爲乾陀羅美術研究的權威底法蘭西的傅歇(Foucher)氏，說明這種美術，以爲是印度的感情，與希臘的美，互相調和的結合。關於他的生成，以爲：單說是佛教與希臘文明相會而造成的東西，是不充分的說明，而敘述其大略如下的主張。即是：關於這種美術，非考察三種要素——工藝家，寄贈者，與關於製作的定做這三種要素不可。寄贈者一定是佛教徒的印度人，工藝家，從彫刻的頭髮，橢圓的顏面，鼻梁與額成直線，其他的眼，口，衣褶等等特徵，都是希臘風的事實，考察起來，一定是希臘人，尤其是佛陀蓄髮，是與佛典不相合的，若果製作的定做者，不是外國的工藝家，便不會特地這樣固執的。但是也很難以爲：是純粹的希臘人，很諒解佛教的宗教感情，才可以做成這樣的製作；大概是由東方化了的希臘人與印度人的雜種的美術家製作的吧！因而這種美術，可以說不是純粹的希臘風，又不是純粹的印度風，好似在雜會壘裏融解兩種式樣，而化學地發生的第三種的物質。總之，以現實的人間的像，來表現超人的佛陀，最初在印度之間是沒有的，不過只以記號來表現之而已；他的信徒，是向住在乾陀羅地方的希臘系的工人的造像技工定做，才想用人像來表現佛陀，接受定做的藝術家，是用希臘系的技術，來製造佛像，以表現佛教的思想與感情；例如從造像的美的要素上，認爲不可缺的頭髮，便不問定做的如何，聖典上所定的如何，而照人的樣子，造上去了。這大體不可不認做是得當的見解。

這種美術的發祥地，通說以爲是乾陀羅地方，這些主張，從種種的證據看起來，是無疑

的。殘留的疑問，是這種美術，從什麼時候起完成了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諸說紛紛，有的說是紀元前二世紀的初半，或說是紀元前一世紀，或說是發生於迦膩色迦王以後；我以為最穩當的主張。依然是傅歇氏之派的學說，多研究屬於這類佛像的結果，他的發生是比紀元稍早的時代，即是紀元前一世紀的末葉，紀元後一世紀之末，他的發達，已經進步到樣式化了。

以上的敘述，是特別關於乾陀羅美術之彫刻方面的，就繪畫來講，約略也可下以同樣的見解。屬於這類的繪畫，保存於北方印度的，是絕無的樣子，依據近年法蘭西的阿富汗探檢隊介紹的，遺存於梵衍那(Bamyan)佛洞中的東西，來隱忍其面影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依此，則大略作下述的考察而無誤。唯，單是這些資料，是不能解決這種美術，發生於何時，完成了怎樣的發達底問題的；但是優良的立體描寫的彫刻藝術流行之時，同式的平面描寫的繪畫，巧拙不要講他，最少沒有並行，是難於想像的，其次，彫刻表示出發達變化，反之，繪畫沒有跟着發達變化，也是難於想像的。現在所有的繪畫資料，幾乎沒有，並不是因為沒有繪畫，而是因為故意或偶然地使之歸於湮滅了之故。

可是，將具有這樣的起源及性質的乾陀羅美術，和屬於在天山南路的西域發現的佛教美術底繪畫相對比，則有很多東西，可以認出兩者的酷似。其中酷似到可以精密地認出其一致的東西，即是跟着從北印度傳入此地的佛教而傳來，照樣製造的；酷似的程度稍低的部類，是跟

着佛教爲各地所消化，經典的翻譯選述等等，益加興盛，而信徒——住民的好尚思想，加於其美術之上的；類似點更低下，可以認出參加有新式樣的部類，不外是跟着中國文明的影響，漸次及於此地，而發生出來的現象而已。然則，關於這些資料，可以認出這樣的遷底時期，是怎樣考察出來的呢？關於這個問題，西歐學者的學說，大概已經一致，而且得到正鵠。依據那些學說，則精密地與乾陀羅彌刻相一致的東西，大略是三四世紀以前的，其次其要素最近於乾陀羅彌刻的東西，約略是五六世紀的，更其次，前者上面加有中國式的要素的，是屬於七世紀，即是唐代以後的東西。但是唐代以後的東西，也有區別，前述諸式腿色，而且顯然可以認出其與中國式相合成的痕跡的東西，說是回鶻時代表現出來的。

以上所述，是關於新出的繪畫的；至於作爲彌刻美術，而占到主要地位的塑像，作爲建築來看待的佛塔，及千佛洞內部的構造，樣式等等則同樣，多是屬於乾陀羅式的，而且一般地承認其原形的保持，比繪畫更久。

可是，製作這種美術的藝術家，是這個地方的人呢？還是外來的人呢？關於這個疑問，也作爲重要的問題，而非考察不可。這有如任何文明史一樣，可以提示出不少的證據證明：當初不用說，其後也是由外來的藝術家的手腕而做出來的。其次，也有很多東西，非歸之於土著人的藝術不可。現今庫車附近的和色爾(Kiz)千佛洞中的一窟，描寫着畫家描繪壁畫的光景，他那奇異的服裝與頭髮，顯然證示出：這些是由晉代到唐代的記錄中，記載著的龜茲地方住民

的姿態。由此觀之，則佛教的感化達到此處，同時，佛教美術的傳授，也實行於此地，在本來的乾陀羅式的美術之上，施以新的潤色，當然可以認出多是由於土著藝術家的工夫。

在信奉摩尼教與基督教的地方，不用說又是伴着各自的宗教而施行各自的美術。從今日以前的發掘，而可以知道的，主要的，是從高昌附近出土的這類美術。元來摩尼教的開祖摩尼，是作為畫家而有名的人，那也影響到宗教上，出土的摩尼教的經典中，很多是用堂皇的插畫裝飾着的。漢譯摩尼教的經典中，有的表示出他的規儀，由此該教的寺宇之中，也規定應該放置經圖堂。可以知道摩尼教是怎樣重視繪畫吧！

到現在止，摩尼教的繪畫，其資料不如佛教的繪畫那樣豐富，尚不至於可以知道其時代的變遷與發達，但是一尋求其系統，自然是屬於波斯薩珊朝的藝術之流的，富於精緻的寫實，與相當裝飾的要素。這些是九世紀以後，此地的突厥民族的住民發生的藝術的影響，似乎大略與前述佛教的場合一樣，一定是他們的信徒之手畫出來的東西，尙遺存着。

基督教的繪畫，僅從高昌附近發見了一種壁畫的斷片，這是描寫日曜日祈禱的光景的。那些可以認做是西方的畫風以外，沒有論述的資料；關於祆教在現今哈密地方，唐代底祆廟中，存有無數的素書的形像與燉煌附近的祆廟中，畫有神主以外，沒有可以依據的材料，很難詳述其形情。

附記：所發見的這些美術資料，尤其是繪畫，屬於宗教畫的最多，但是宗教畫以外的東西，例如以一般風俗與花鳥爲題材的東西，也不是沒有。是這一類的繪畫，以爲是屬於中國唐代以前的時期底繪畫，依然是用波斯系的畫風畫的，表示出西洋文明的潮流及到此處了。缺乏陰影的古代中國式的繪畫，幾乎完全看不見，顯然表現出有中國畫的特徵的，同宗教畫一樣，可以認做唐代以後的事實而無誤。

第十七章 中亞與漢文明

在廣汎地分布於中亞的民族上，從古時起，就受到伊蘭文明暨西方文明的影響底情形，大略如前所述。然則東方的漢文明的影響，沒有及到這個地方的住民嗎？現在便非進而論述這個問題不可。

中亞與中國的政治交涉，從漢武帝之時開始以來，中國的軍人與官吏，便駐屯於天山南路的各處，擔任對北人的防備，與地方政情的監視，漢之商人，便在其保護之下，遠往來於葱嶺以西的地方。官商都稱爲漢之使者，一組多則數百人，少則百餘人，有些年期，這樣的隊商，出到十餘隊。跟此而發生的最大的困難，是途中無人之地的糧食的缺乏，所以在適當的各處，置屯田兵，不單爲戍者自身，同時並使之準備使隊商客易往來的粟糧。這種辦法不獨在漢代，就看做是其後因經營西域而採用的新法，也無錯認。因而，漢代以後，除去某個時期以外，最少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雖有多寡的程度之差，但是漢人種的住居於此，當然是不斷的。若是這樣的狀態，則漢文明跟着他們導入於此處，是不用說的，近時東西的探檢發掘隊，獲有不少屬於漢文明的資料，即是他的殘留而已。這些資料之中，最初是屬於紙未發明的時代底東西，即是寫在木簡，絹上的記錄書簡之類，和那僅僅與日常生活有深厚關係的書籍，如曆書，占卜，藥方，兵學，算數，小學的部類的東西，都從那烽台（從燐煌到羅布泊方面）的廢墟中

發現出來了。後漢時代用紙以後的材料，數量漸增，從晉到南北朝，其種類也多了，書籍，尤其是漢譯的佛典，以高昌爲中心，顯然出土了不少，降至唐代，數量與種類都增大了，文書，記錄各種的佛典不用說，從經籍，史籍，詩文之類到道教的典籍，都出土了，其出土地點也廣涉各地。知道這樣的情態之時，無論誰都不能否定：漢文明從古代起就及到了此地的事實。

但是若果我們考察漢文明這樣的流行，是流行於怎樣的人們之間的話，則只有看做：是流行於住在此地的漢人之間。不然的話，則不外是在中國內地，受了漢文明的感化的外族，遷到此地，依然維持他的文明而已。例如：高昌出土的漢文的佛典與記錄中，殘留有漢人以外，匈奴種的沮渠氏的東西，便是；他們一方面說是匈奴種，同時已經是爲漢文明所同化的準漢人，占據張掖——今之甘州，而建立北涼國的，爲後魏所逐，而逃到此地，所以作爲他的殘留而出土這樣的東西，是當然的情況。要之，在這個地方，漢人或準漢人以外，沒有殘留這樣的資料的人，發見這種遺文的地方，可以看做是因爲什麼事情，爲他們所住的場所。此外的人種，是否在此地受到漢文明的影響，結果遺留有這樣的文獻的，例如在日本朝鮮可以認出的情形，殆無可疑。然則，真是漢文明少給西域人以影響感化，從漢人到此地以前起便看見：全在這個地方，經營城廓生活的天山南路的西域人之間，從西方東漸的文明普遍了。這些因爲人種，言語，交通事情等等的關係，當然是從古以來，就可以承認的現象，是不足怪的。連文字文章，都接受漢文明是作爲困難的事情而不可不尋究出：沒有經過翻譯將其影響達到他們之間的證據

嗎？那些在今日可以知道的範圍以內，也是難於證明的，所以假使有的話，那也無疑地是不顯著的。

此外從美術工藝方面考察起來，則中國美術家畫的繪畫，從西域發見出來的，顯然不能追溯到唐代以前。西域畫風，對於中國的影響，已經在南北朝時代就可以辨認出來了，這是周知的事實，但是反之，中國畫及到西域的影響，在這個時代，却認不出來。中國的工藝品，其中以絹帛為首的各種織物類，與漆器鐵器之類，是西方諸國所垂涎的，從西域各地，作為遺物而出土的不少；但是就是這些也不能限定是西域人使用的，其中必然有的是住在此地的漢人所使用的；其次雖想模倣其製作，但因為材料的缺乏與製法的特殊等等事情之故，沒有達到模倣的目的，無論什麼時候，都依然是從中國本土輸入來的為多，也是無疑的。

由是觀之，則天山南路的西域底唐代以前的中國文明，實在是住在此地的中國人所有的文明，尚未至於給西域人以大的影響。他的情形，恰恰可以和前述古代希臘文明在伊蘭民族中的關係相匹敵吧！但是那個場合，也如特別記述了一樣，相異的文明，互相接觸之時，自然會多少互相發生影響感化，那不用特加論述，而非豫斷為當然的事情不可。唯在此欲加以敘述的，是兩者接觸的結果，漢文明不至於發生顯著的影響，給已經完成了高度發達的西域文明的性質以變化，使其潮流變向底事實。

本來中國統治西域的方針，漢代以來常常是表面的，有如反復敘述的一樣，只不過防止這

個地方歸於北人的勢力之下，而且保證中國與葱嶺以西的地方的交通貿易之安全而已，達到這個目的以後，便不會特別親自深入其實際的政治。簡而言之，從中國派遣來的都護，長史，與其從屬，不過從大體上監視西域人自己舉辦的政治而已，實際上與西域人的社會，生活，沒有特別密切的關係，例如他的住居，也是特別住 在一個區域，避免混住。因而文明已經發達的西域人，沒有那樣容易為漢文明所同化的理由，反而如高昌地方，從事學問而講習經學詩史的漢人，實際生活有使用胡語底時代。然而這樣表面的統治方針，至唐代而一變，成為非常實際的統治，最少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唐代的官吏，已經直接細密地關係到土人的政治，這是依據各種新出土的文書而可以知道的；同時住在此地的唐人也增多了，從下述的狀態——從來主要的不過是駐屯武人與官吏而已的狀態，發展出來，而成為一般人與僧侶多住的情形，這種事實，也是從新出的戶籍，與各種文書，或雜記見聞的旅行記之類，而可以認知的。如前所述，屬於唐代的漢文明的典籍佛典記錄之類，在新出土的資料中，顯著地增加了。那不外是西域住的唐之僧俗增加的結果而已。不單這些資料的增加，就如繪畫，也發見了不少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從其顯然附有唐代的年號，或從無年號，但從其畫風，配景物，與其錯題的情體看起來，無疑地是屬於這個時代的。其中多是佛畫，此外也有風俗畫與人物畫，佛畫中，也有珍奇地用水墨畫的純中國畫。這些繪畫也不外證明：多數西域住的唐人之中，已有以繪畫為專業，或至少可以畫出這麼美觀的藝術家。這樣與各方面有關係的唐人，住在西域在政治宗教，

與其相一般的社會生活中，和士人之間，有比以前更親密的關係，是可以想像出來的，那麼兩種文明的接觸一定也增加密度，西域文化的中國化，多少都增高了他的程度。但是到今日可以知道的地方，尚未達到可以的確證明這一點的狀態。裝飾各處于佛洞的繪畫，暨其他資料之中，也交雜有一種特徵，可以在西域風中認做唐的手法；但是那些很難認做是傳述那種手法的西域人的製作，毋寧應該看作採取西域風的唐之藝術家在此殘留下來的紀念，例如唐之學術，文學，譯爲西域語的東西，也無發見。偶然有屬於這一類的東西，但那却是中國內地完成的事業，不是講出西域文明的中國化。如此就現在所知的資料而考察之時，則這個時代，漢文明對於西域人的影響，不是很顯著的，依然不可不以爲：這個地方，流行着出自西域文明之流的東西。但是想到上述唐人向西域進出的事情之時，則不可不承認：一般西域文明之漢化，至少比漢以前的時代更進一步了吧！

對於這樣的情勢，到晚唐期以後的時代，此地的文化之中，中國的色彩漸漸顯著，使東西文化融合的文明顯然抬頭了。在此打破從來悠長的歷史，發生如此的新現象，乍看起來，也可以以爲是極其不可思議的現象；其實非說爲當然的情形不可。這是因爲：使這種情態發生的西域人，不是中唐時代以前的西域人——雅利安種系統的人種，他們沒有自然之間使之發達起來的高度的文化，而且是親自接近唐與伊蘭文明的突厥族的一部回鶻（回鶻）人之故。

以上所述，是關於回鶻人佔據中亞以前的情形，單是關於天山南路的西域，關於其餘的地

方，大概也可下以同樣的見解而無誤。從天山南路到其西方的突厥族的遊牧地帶中，使用唐代開元通寶裏面，鑄有突厥文字的銅錢與突騎施錢——單單形態是模倣唐錢而鑄窣利字（後世呼為回鶻文字的）。突厥語的錢文底錢。依此則唐之文化勢力，乍看起來，好像很達到此地，其實這些也類似希臘人統治下的大夏的情形，可以說是從下述的關係——高宗以來到玄宗時代八十年左右之間，這個地方隸屬於唐，在其統治之下的政治關係發生起來的現象，不能只以這些來推測其全般。有如依據他的錢文的文字自身，已是西方系的，事實而可以知道的一樣，在他們本來的遊牧生活上，新施的潤色只能以爲：大概有如窣利的文明一樣，是西方起源的。

窣利與唐的各種關係，因爲繼續數十年的隸屬關係，進而比從來任何時期都密切得多；雖然如此，但是大體上講起來，依然很難說唐文明的勢力，顯著地及到此地了。但是根據這種關係，可以看出：在工藝方面，已經給以相當著目的影響。如前所述窣利人，從往昔起，就以商人的資格，來到中國，購買各種產物於雙方，而計求利益；但是唐之中亞經略，更促進唐人向西方進出，窣利人向東方進出之勢，結果，不單將中國的物產，由他們之手，輸出於西方，同時還以撒馬爾罕爲中心，各方經營利用中國技術的工業，產出各種的工藝品。就中最非注意不可的，是那密水流域地方，此後成爲絹與棉的織物製造地，馳名於回教諸國之間。又如在西方近世文明的發達上，具有重大任務的紙，也是唐與大食在那密水畔的戰爭中，爲大食軍所虜的唐人，最先在撒馬爾罕傳授用櫛樓製紙的中國製紙法，以此爲基礎，終於使撒馬爾罕成爲製紙

的地道，乃是周知的事實。如拔汗那的鐵器武器，也作為他的重要產物而出名，這據說是淵源於漢代中國的鑄鐵法的傳入此地；但是從這個時代起特別有名的事實考察起來，則又是新導有唐代的技術吧！大凡中國的工藝品，當時在回教國民之間，博得非常的聲譽，終而至於將一切精巧的工藝品，都稱爲「中國品」，所以敏於商機的塞利人等等，不單乘此輸入這種物品，同時還達到下述的情勢——在那裏役使唐之工藝家，或自己傳習唐之技術，盛行製造這種物品的情勢。但是，尙沒有資料，他的一般文化，受了唐的影響，可以與此並駕齊驅；在這一點，便不得不承認：他們的文化，反之在唐之長安，洛陽各地，更爲唐人所讚美稱頌，超過唐文化之在西域所得的讚美稱頌。

第十八章 回鶻的西遷與西域文明

晚唐時代，回鶻部族，從漠北移轉於西方，古據中亞是一種顯著的事實，便長久繼續下來的人種分布圖，塗過顏色，同時又是一大事件，可以在這個地方的文化史上，劃出一大轉換期。這是因為上述西方文明的潮流，在此與新導入來的東方漢文明的潮流相匯合而成滌，因其混淆的成分之透徹，使此地未曾看見的變種之花，在文化的野邊，開放了之故。現在當敘述這種情勢之際，非先略述他們在漠北外蒙古之時的文化不可。

本來住在漠北，只有低級文化的遊牧民，進入有紀錄的時代以來，不斷地與中國相接衝，因而受了他的發達的文化底影響，是不用說的；這種情形，我以為不是進入有紀錄的時代以後，俄然發現的，從悠遠的時代起，就大略是同樣。但是，他所接觸的文化，不單是中國的文化，有如近時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的結果指示出來的一樣，在這個時代以前的人種，或是以後，而不及紀錄的北方人種的遺物之中，有不少東西，是另屬於西方系統的文化底色彩的。他們的文化之中，屬於漢代及其以後的時代的，可以認出其是引自這兩個系統的，乃非看做是繼承這樣的情勢不可。依據中國的紀錄，則沿天山南路的地方起，到向阿爾泰方面的商路，明白指示出來的，不是追溯到唐代以前；這條交通路，從史乘上記載的各種事情考察起來，則無疑地自然是從漢代就開通了的吧！因而在其以前，也非及到不可的，有組織的隊商，便追蹤輕快

的騎馬民族往來的道路，而開拓商路，是當然的；而古來在漠北古有勢力的民族，常常對於中亞伸其經略之手，是和後世的突厥回鶻一樣。——知道這種事實之時，則毫無疑義地可以承認兩者之間，從古就有了交通關係的事實吧！此外通過北方西伯利亞的往來，也是可以想像的，但是這在後世，也是屬於記錄的範圍以外，向那一方，走那一邊呢？這只有等待今後考古學的研究的更加進展，而決定其主意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至隋唐時代，窣利地方的人，也盛行擠入漠北的突厥族——突厥，回鶻與黠戛斯部族之中，活動於各方面；這種形勢也不是俄然表現出來的，也承受其從來的形勢的，這看做不外比較明瞭地記錄下來的而已是至妥當的。總之，從天寶之初頃起，統一漠北的回鶻部之中，是和其從前的勢力突厥部一樣，有很多窣利人活躍着的事實，是無疑義的。唐代史乘中，稱爲九姓胡的，即是那些。回鶻幫助唐室，平安史之亂以後，兩者的關係更加密切，回鶻人往來於唐，或居留於唐的加多了，同時唐人擠入回鶻的也多了，因而唐之文化，影響於回鶻的事實，也愈加顯著了；同時安史之亂之時，在唐的西方的摩尼教僧侶，跟回鶻而入於其地，摩尼教便以此爲契機，大流行於回鶻人之間，因而一般窣利文化新爲其勢所推促，而影響及於回鶻的社會。如實地象徵出：這種唐與窣利兩種文化及於回鶻的影響之一例，可以在回鶻的保義可汗紀功碑中辨認出來。這位可汗，是九世紀之初葉，詳言之，是八〇八——八二一年之間在位的人，碑是在回鶻的都城，現今外蒙古鄂爾坤（Orkhan）河左岸哈喇巴爾迦遜（Kara Balgasun）的廢墟中破碎地遺存着，這是一八九〇年

芬蘭的亥刻爾 (Heikel) 氏，在這個地方旅行而發見的，於翌翌年，將此傳述於學界，一八九年五年俄國的拉道羅夫 (Radloff) 教授，更重將此事，提示於學界。其後經過各家的研究，在今日，已經知道：他的碑文是用回鶻語，窣利語，及漢語三國語書寫的，而三者之中，依據其最明瞭地可以讀出來的漢文的記事，可以知道這碑是爲保義可汗的紀功而建立的。這個碑文，是用三種語體書寫的事實，是非常之可以注意的。一面的回鶻語，是用突厥文字（也可以稱爲葉尼塞 Yenisei 文字）——從突厥時代起，便使用於此地突厥族之間的突厥文字書寫的，他面的漢字漢文與窣利字窣利文是各寫半面，其餘各各繼續寫於碑之兩側。突厥字不用說是與前代的突厥人一起，是他們當時使用的文字，（他的源流出自西方的阿拉姆 (Aramaic) 文字系統，通過中亞而行使於葉尼塞的突厥族之間，漸次及於東方的）。其次所謂回鶻文字，——將窣利字稍爲加以變化的文字，沒有使用於他們之間。換言之，這些是代表他們本來的文化的，加之以外是當時在此地佔有勢力的漢文化與窣利文化，各以其文字言語表現於碑面而已。突厥時代幾多的碑文之中，雖然窣利人與突厥的政治深有關係，但是用窣利語記事的碑文却一個也沒有；突厥文以外，併用外國文的，只有漢文；反之回鶻時代的碑文，便表現出加用窣利文的三種字體的碑文；關於這種事實，便不可不認出：當時不單是政治問題，就從宗教上深入回鶻社會，在其文化上發生影響，更空前地關係到他的政治底窣利人的存在與其勢力。如是，本來是接授中國與西方文化的漠北地方，到回鶻時代，他的趨勢更進一步，兩文明的合成作用顯著起來。

了，終於表現出這樣的碑文。這樣的碑文自身。從其性質上，形式上來講，不用說是屬於中國文化的；但是若果碑上刻的東西，不是文字，而是雕刻的話，則如後所述東西南系合成的東西，老早就粉飾了兀立於漠北砂原中的碑面了吧！

在這樣的文化情態中的回鶻部族，到晚唐時代，遷於西方，其勢力從高昌進而發展於各方，驅逐原來的住民而自己佔據此處。如是，從來固着於西方系的文化，對於東方文化，缺乏感受性的西域地方之文化相，便跟着住民而一變，表示出攝取兩者，合成兩者的新樣相。現在就其信奉的佛教，而敘述這種情形。

回鶻人，如前所述，從住在外蒙古之時起，就非常信奉摩尼教了，所以西遷後也維持其信仰，十世紀之初葉，鹹海之南的地方呼羅珊的領主欲迫害摩尼教徒之時，回鶻人便敢然抗議他，擔任同宗徒的保護；其中漸次接受佛教的感化，而改宗的似乎不少，至宋初，也可以從記錄上確實這件事情。但是事實上似乎是西遷後不久，就發生了這樣的改宗者，從這個地方出土，普通稱爲回鶻語的佛典之中，便不可不認出：在唐之末葉，已經有爲他們所譯述的東西。這些佛典之中，記載有：回鶻人舉部遷於西域以前，便有少數定住於這個地方的突厥族，——其中回鶻人自然混入了吧！——如突厥之類，其時也信佛教，因而也有已用突厥語翻譯的佛典而混雜有那些出土的東西；但是突厥與回鶻的言語，幾乎是同樣，不能區別出來，而其文字，都是用後來稱爲回鶻字的字體書寫的，占多數，所以將這些同樣稱爲回鶻的佛典，這是非常不

精確的稱呼，其實在回鶻的佛典譯出以前，已經有從言語上來講，文字上來講，都與回鶻沒有分別的突厥的佛典了，這是非知道不可的事實。例如前面第十五章，關於佛教經典而加以敘述的地方所說的有譯爲突厥語的跋文的佛典便是。此外，也有具有譯爲回鶻語的跋文，與不是跋文但伴有可以認做回鶻語的證據底佛典，有很多是不容易判然識別其是那一種的。所以不可不理解：所謂回鶻語的佛典之中，有的屬於回鶻西遷時代以前的，同時作爲摩尼教徒而爲人所知的回鶻人之中，遷移後不久，便有歸依於佛教的，這是依據新出土的資料可以證明出來的。

可是若說這種回鶻的佛教，是出自如何的系統，則可以知道：其佛典與突厥的佛典一樣，是依據西方的，其次也有譯自西藏文的以外，顯然從漢文中譯出來的佔多數，例如在中國撰述的僞經，也譯爲此語，而盛行。這些是用前述吐火羅語與于闐語等等書寫的，不能認做是從古以來，就實行於此地的佛典，是他們的佛典的特徵，同時雄辯地證明他的佛教系統，廣引自各方面的事實。

這樣出自各方的系統底文化，實行於回鶻人之間，自然不是單單關於宗教。若果更在他處尋求其例子，則關於日常生活的占卜，也是實行東西兩系統的方法的，一方面盲探地撰出基督教聖書中的文句，由此以判斷吉凶禍福；他方面，又另外輸入中國易卜的知識。——這兩種事實，都是依據翻譯爲回鶻文的書籍之出土而可以證明的。此外屬於這一種類的例證，依據今日確實的史料，是可以舉出很多來的，在此不及一一記述之。

總之，在那新入於定住生活的回鶻文化的處女地帶，活下去的種子，得到生育茂盛了。這些異種文化之間，順從時日的經過，而發生混種，合成之勢發展下來的事實，是當然的情形，這種混種合成，不可不說是回鶻文化的特徵。在此以前的時代，西城人漢人，各保有其傳統的文化，割據於各方，因而沒有表現出顯著地融合的痕跡；現在回鶻人不問文化的系統種類，而廣汎地攝取之，所以這些文化，在他們的社會中，漸次發生混和，形成一個渾然的合成式的文化，本來不是不可思議的。在已往，便應該發生，而沒有顯著地發生的，東西文化在西域的混和合成，不外是因為那個地方的西域人與漢人互相固執各自的文化之故；而沒有這樣的固執，尚在低級文化情態中的回鶻人，佔據這個地方以後這種混和合成，毋寧非看做想避免而不能避免的形勢不可。換言之，使西域地方出現這種有合成特徵的文化，是回鶻人佔據西域，當然發生的使命。然則，他的合成，是怎樣的情形呢？現在試就二三的例子而證示之。

回鶻人之中，遷移西域後，沒有幾久，便有人從摩尼教改宗佛教底事實，有如前面敘述的一樣，但是當他們改宗之際，便將摩尼教的思想，導入於佛教之中，將此混和合成之底痕跡，是可認出來的。即是：在回鶻的佛教，對於諸天與惡魔之名，當於摩尼教諸神之名，例如將梵天(Brahma)稱爲 Azrua，帝釋(Indra)呼爲 Khormuzta。Azrua 不外是伊蘭神 Zerwan 的轉訛，Khormugta 也是伊蘭神 Ormuyd 的轉訛而已，將惡魔稱爲 Samnu，也同樣是從摩尼教導引出來的名字。這樣的轉訛，會以爲只是名稱的轉用而已也未可知，但是，至少，這

樣的轉用實行當時，可以看出：摩尼教與佛教之間，因此而有某種脈絡相通的事實吧！換言之，可以在其間看出暗伏着一種神佛同體的思想吧！順便講一講，這些名稱，在蒙古的佛教中，也同樣使用，這不外是回鶻佛教影響及蒙古佛教而已。

其次更將此地回鶻的摩尼教徒之間使用的一種曆，作為一例而考察之。這種曆，是用窣利語書寫的，各個日子，都併記着：窣利中國與突厥三種的讀法。即是：各個日名最初是配以窣利語的七曜日，而揭示其名稱；其次使之對當於中國的十干——甲乙丙丁等音，再其次は鼠，牛，虎，兔等等；在突厥用來數算日脚的十二支獸的名稱，便用突厥語配當起來，更在其上，將中國的五行名——木火土金水的名稱，譯爲窣利語隔日用紅字記之。這種曆，畢竟可以看做：是此地使用窣利語的摩尼教徒，合成在當地實行的三種文明而作成的東西，很能代表此地此時的文化性質。

與此同樣的傾向，在他們遺留下來的美術上，也可以明瞭地辨認出來的。前面已經講過了：唐代漢人多進出於西域，漸次生出渾融中國與西域兩種畫風的美術底事實。這種情勢，至回鶻時代而愈加顯著地表現出來了，附有回鶻語的題銘，與功德記的壁畫，天花板，乃至描在紙布上的繪畫，無疑地是當代的作品，兩者合成的痕迹，顯著地可以認出來的佔多數。學者之中，對於這種特徵，有人附以回鶻式的名稱，劃出一個新時期。

依上所述，大略可以說明回鶻文化之合成的特徵。但是作為合成的要素是以東方——中國

文明爲主呢？還是屬於西方系統的東西爲重呢？這是因其種類，時代與場所等等關係而不同，不一定可以一概而論的。或者也有將此要素非認爲主要地屬於西方文化的不可底論者，但是那是極其粗笨的議論，不足爲據。

第十九章 突厥族與回教

從第九世紀之末到第十世紀，翠利及花刺子模地方，是薩曼尼朝（Samanides）統治的時代，首都不花刺的繁榮，是在領主伊斯邁爾（Ismail）之下，達到隆昌的極端，成爲東方回教文明的中心地。以碎葉川河畔的斐羅將軍城（Balasagun）爲根據地的突厥族的酋長波克拉（Fatoq Boghra）汗，於十世紀的後半，率領二十萬張幕的居民，歸依於同教的事實，在第十五章中，已經敘述過了，這個事件，即是散馬尼朝統治時代的事件，不外講出回教伴着他的勢力的發展，而進出於東方而已。雖依據唐初玄奘三藏的目擊也可以知道：這個地方的突厥族之間，元來是以信仰祆教爲主，但是那些於這個時代，也受到從翠利地方傳來的文明之感化，而出此大集團的改宗之舉。

然而十世紀末葉以後的情形，是散馬尼朝的權威衰弱了，一方面有內部的紛爭，他方面領土內的突厥族逐漸抬頭，自稱君主，這個世紀之最後那一年，波克拉汗的後嗣伊利克（Elik）汗侵入不花刺而代替了薩曼尼家。這一家的勢力及到天山南路的西方，我想大略是從這個時代起的；但是依據回教徒史家的記錄，則是一〇四三年，斐羅將軍城及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即是漢代以後稱爲疏勒的地方）附近一萬張幕的住民，歸依於回教。這不可不承認：也是占領翠利地方波克拉汗家——喀喇汗（Karakhanides）家的勢力，也發展於天山南路的西部的結果。這

一世紀之末，喀什噶爾之南的葉爾羌（漢代以後稱爲莎車的地方）也信奉回教了，這種事實，依據此地新出土的文書，而可以顯明地證示出來。那種文書，是伯希和獲得的，記有一〇九六年的日期的，是此地突厥人關於買賣土地的文書，在回教徒的官吏面前誓約，用語是阿拉伯語，書式也是回教徒之間普通使用的形式，記名是混用阿拉伯文字與回鶻文字。對於阿拉伯文字不能書寫的東西，一定允許其使用回鶻字。回教傳播以前，天山南路的突厥人之間使用的這種文書，用語是突厥語，書式完全是模倣唐人使用的形式的，但是跟着他的傳播，而發生了這種的變化。

同教傳播於突厥族之間，也與其他的宗教，例如摩尼教的傳播一樣，盡了大的貢獻，不單在信仰上，而且使他們一般的文化向上，這是非注意不可的事實。如前所述，回教徒，是非直接學習阿拉伯文的聖典不可的，所以他的文字與言語，跟着信仰的興盛，大概有種種便宜可以普遍而急速地傳之於教徒之間。因而也讀解聖典以外的阿拉伯語的書籍，而得到各種知識，同時在這些突厥族之前開闢了一條道路，可以用他們的言語，而由這種文字表現其所欲言的地方。有名的 Kudatuk Bilik（「得到幸福底知識」之義）這部書籍的出現，可以說是着了這種趨勢的先鞭，在此便是突厥文學勃興的序幕揭開了的原由。這部書是一〇六九年，裴羅將軍城的幼士夫(Yusuf)這個人，在喀什噶爾著述的，上呈於君主喀喇波克拉(Kara Boghra)汗的，依據現在維也納保存的寫本，則全舊有七十二章，使用當時此地使用的突厥語的韻文，用阿拉

伯字書寫的。但是此外還有用回鶻字書寫的，這是爲着不慣於阿拉伯字的人，而另外用這種文字改寫的。其內容的主要，是站在回教道德的立場上，來敘述處世的道德，用擬人法來處置正義，幸福，悟性，滿足四者，採取的方法，是用這四個人的問答的形式，來敘述正確的出路。著者說：這部書主要的是爲王者而著的，但也通於萬人。著者自己又說：用阿拉伯語與波斯語著的書很多，但是用我們突厥語著的書，却以此書爲首，突厥人因爲此書是用突厥語著的，所以張目而驚嘆。在回教徒之間，若說是書籍，則普通只知道用阿拉伯字的波斯，阿拉伯等等語言的書籍，在這樣的時代，這個地方，有了使用同種文字的自國語的大冊子，則他們的警異與得意，是很可以想像的。而將此地突厥族的文化上底這樣的發達，歸因於回教的信奉之時，縱使單以此事來講，無論誰，也會承認其一般的貢獻之大吧！

如是回教徒突厥族，揭開了文運進步的序幕，例如阿拉伯語與突厥語的對譯辭書，幾乎是與 *Kudatuk Bilk* 同時代編纂的，但是文化的一般的水準線，不會那樣容易提高的，突厥文學具有非常的發達以前，尚需要三世紀間的歲月。然而當時塞利人已經因爲侵入兩河地方而占領此地的突厥族之故，而達到敗滅的悲運，久有由緒的塞利文明，也於十一世紀的中葉，連他的言語都失掉了，取而代之，在此地發展其勢力的，固是屬於伊蘭語的波斯語。因爲宗教上的關係，當然阿拉伯語應該占到這個位置，但是阿拉伯語，不用說是閃（Semitic）語，與伊蘭民族的言語不同，所以回教徒征服波斯以後，東方伊蘭民族，因爲各種事情，總是與報達的教主的

政教就發生扞格，所以言語暨一般文化上，自然在其固有的地方，具有強硬的執着。如是從來由中亞到東方這一帶地方，最廣用的突厥語一滅亡，自然波斯語便代之而抬頭了，突厥文學興盛以前，繼續保持了這種情形。就在蒙古時代，中亞及其以東的國際語的位置，也爲波斯語所占據，是大家周知的事實。

蒙古佔有中亞，在中亞史上，自然是大事件，但是從文化方面考察起來，則使其發達的步調遲鈍了的事實，縱使是不可爭論的，但是沒有使之因此而發生特別大的變化。元來這種蒙古族，是崛起於漠北的小部族，文化發達的程度，也與附近的類族一樣，到底不脫未開之城。跟着他的勢力的發展，漸次各種制度也整備了，但是那不過採取當初先進各民族之間——如契丹，女真，回鶻，——發達了的東西而已，就中多負於回鶻文化底事實，是可以就其文字的襲用暨幾多事實，而得到證明的。蒙古族的活動，有時代可以說是惡魔的跳梁，到處破壞所有的文化而去，但是這不一定是妥當的見解。對於抵抗的人的虐殺與破壞，徹底地實行了，但是對於不抵抗的，却置之不理，便是其一貫的方針。因爲是自己沒有可以執着的固有的文明，而注意採入所在地的文明的長所底蒙古族之故，所以他們占據中亞以後，縱使不能看見其對於文化的發達，有盡力的功勞，但是沒有故意出於阻止文化發達的態度。因而中亞的文明，於蒙古族占領這個地方以後，也緩慢地追着其發展的趨勢。其實如回教，也沒有從蒙古政權那裏，受到什麼迫害，與其他的宗教一樣，也承認其可以自由信仰，宣傳，因而他的教徒任用爲蒙古的官

吏，也沒有什麼限制。成吉思汗西征當時，在花刺子模的都城擢拔起來的，歷任其後數代的可汗，而在財制上建立大功勞的牙老瓦赤，嘛速忽父子兩人，暨其他回教徒之為蒙古朝廷所重用者，自然是不勝枚舉。錫蘭阿母兩河之間的地方，在蒙古政權統治之下的初期時代有一位擔任其庶政底有名的宰相 Jameat-al-Mulk，這不用說是回教的教徒，那個時代此地沒有多數的回教的寺院及學校，是為人所周知的，對於這種事業也沒有受到何等的壓迫。是這樣的情形，所以回教在這個時代不單是益發擴大其教緣，終於幾乎完全普及於突厥族之間，而且造出一種機運，使新到中亞的蒙古族之間，發出改宗者，更加廣汎地進出於東亞。

如前所述，蒙古經略中亞之後，其地主要的是察合台汗的所領，而且已經在東西突厥斯單經營定住生活的突厥族，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一樣，因此在人種上，文化上俄然使之蒙古化了的。其中，各有其所以然的理由，決無可怪。作為他的主要理由，而不可不舉出來的，是兩者生活狀態的不同這種事實。即是：蒙古人占領了這些地方，但其自己沒有馬上和當地的突厥人為伍，而經營城廓生活，各在城邑的附近，經營原來的帳幕生活，不過以侮蔑之眼來監視城邑之民而已。佔據城廓之內，營營勞動而繳納貢賦給他們的情形，到底不是他們——其生活如他們的一條鞭子而動作的家畜，相同，放浪於大自然中的他們——可能忍耐的吧！所以就如這個大領土的君主——察合台自身，他的居所，也是伊犁河的上流，現今的固爾札(Gürz)附近的水草地，而不是建都於重要地點的撒馬爾罕，與不花刺我想一定是由察合台與其部下，

最希望在這個地方享樂帳幕生活，或近似帳幕的生活的緣故。對於元世祖建都於大都——今之北平，進入宮殿榮華的生活，便有北方的宗族，遣使責難其忘了蒙古的習慣，也有在大都特設帳幕，而宴飲安居的事實。所銓在當初，蒙古人與突厥族中的定住部族，各自的生活情態，是互相懸隔的，因而突厥族，從其舊來的文化上，人種上，都沒有受到大的影響。而且這種情形，不單是當初暫時的現象，大多數的蒙古族，勢力興盛之時，似乎也維持了同樣的情態，帳幕的住居——*Ogh* 與 *Ai* 的言語，繼續關係到：此後中亞蒙古族的歷史，而表現出來。但是不是集團的，而是比較少數的人們，尤其是屬於蒙古族中的上流階級的人，漸次遷於城廓生活；必要上非加入城廓生活不可的東西也增加了，但是伴此而生的人種文化的影响，從突厥族及到蒙古族的，比從蒙古族及到突厥族的要顯著。即是這些蒙古族，在其生活狀態的變遷中，先受到突厥文化的感化，馬上理解突厥語，信奉回教，也有娶突厥人而生雜種的，漸次多數的人，都跟着娶突厥人爲妻，族姓終於成爲空名了，這不可不說是當然之勢。雖然如此，但是變成這樣的情形以前，需要相當的歲月，不是急速地表現出來的。

總之，回教在中亞的突厥族之中，先傳之於佔據西部中部的突厥族之間，接着才漸次及到他的大部分的，這樣的回教，在使這個民族的文化發達上，作了至大的貢獻，比那佛教與摩尼教曾經育成一部分的西突厥與回鶻部族的文化底成績，優而不劣。若果不重視這種關係，則不能體認此後突厥族的文化。

第二十章 帖木兒王朝與突厥文明

察合台死後，二百年左右的中亞具體地講起來，是權力鬥爭的時代，其間，有三十位以上的察合台的後裔，繼續反覆弑逆廢立，而卽王位。雖然如此，但是—三二一年頃以前，包含東西兩突厥斯單的察合台時代以來的領土，及—三一〇年頃，成爲滅亡樣子的窩闊台汗的領土之大部分，也還統括在一位君主之下，這一年以後，便分裂爲兩部，即是回教徒史家所謂的西部的河中(Horasan or Transoxiana)與東部的蒙古勒斯單或者台，(Mogolistan 或者 Gansu)各立君主了。河中以外的察合台家的領土，合有天山的南北，而用這個蒙古勒斯單或者台的名字稱呼之。這樣頻頻發生的王位的爭奪，即是意義到無間斷的領內的擾亂，占住民的大部分的突厥族，常常爲鬥爭所驅使，辛苦建築起來的城邑之繁榮，每一爭亂，便任其掠奪蹂躪。尤其是分裂以後的西部——河中的情形，是慘憺的，此後五十年之間，立有十五位左右的君王，常常反覆表演這樣的光景。這些王者之中，有的已經歸依於回教，例如分裂以前，一三〇八年頃卽位，說以回教的宣布是其任務的達里克(Darik)，又如被人非難爲：輕視蒙古族神聖視之的成吉思汗的遺法，而尊重聖典古蘭，因此爲人逐出河中王位的塔爾馬志令(Tarmashirin 約在於一三二一——一三四年頃)便是；而且他的信仰，沒有什麼貢獻，可以使這種局面改變。這樣的情勢，即是蒙古族占據中亞以後，使突厥文明的發達，變爲遲慢的理由，雖然不是故意出

於阻碍其發達的態度，但是結果，他的責任是不能不歸到他們身上的。

分裂以後，五十年間，在河中反復發生的這樣的擾亂情態，因英傑帖木兒的出現，而告終，同時他的勢力遠鶴過察合台家統一的時代，出現了中亞史上未曾看見的大盛況，這是前面敘述了的事實。如是百餘年之間，只發芽而不能伸長的文明，便似春天的草木一樣，俄然張其枝葉，馬上開放了誇耀其好色好香的突厥之花。在阿爾泰谷中散下種子，最初開的這種花，實在是跋者帖木兒的粗野之手所育成的。

帖木兒的系統，出自蒙古的巴魯刺思 (Berlas)，但是從什麼時候起，是很難斷定的，縱使最遲，也是他的父親的時代，就已經占領撒馬爾罕南方的怯沙 (Kesh) 地方了。帖木兒也是生於這個鎮上，老早脫去了。蒙古的驅殼，而長育於突厥文化之中的人。英雄的生涯中，有如普通一樣，帖木兒的一生，也決不是前途坦坦，好好兒克服困難的，於一三七〇年，才將河中握在掌中，是大家周知的事實。撒馬爾罕，從其不久以前起，便是察合台家的居城，帖木兒也莫都於此，開始着手其一生所愛護的這個市鎮的經營。據說帖木兒在血腥擾亂之間成爲人，讀書寫作，則突厥語，蒙古語以外，也通波斯語，好讀戰史傳記之類，樂聽醫家，天文家，法律家等等的議論。他的信仰，不用說是回教，由聖僧的祈禱，來開闢勝利的運命，是其最熱心的祈願。具有這樣的教養與信仰的人，便是用其天賦的武勇與機略，來完成大的經綸，在新而有秩序的國家組織之下，統轄有如亂麻的天地的。在此跟着他的統一，而發生文運的開發，正不可

不說是當然之勢。粉飾撒馬爾罕鎮上的王宮的經營，寺院之建立，學校的設立，運河的修築等，是由內外的技術工藝家之手，而接續舉辦的，使知道此鎮的廢壞的情形的人，爲之驚嘆；並舉行各種文化的設施，在宗教方面，也發生新的僧圖；但是更非注意不可的實是突厥文學興隆的運命之開闢。

十一世紀的中葉，幼士夫著的 *Kudatuk Bilik*，如前所述是表現出突厥文學的序幕。但是這一序幕閉幕以後，舞台被原樣地放置了三百年之久，這不可不說是相當長的過幕。而今這個幕，被帖木兒揭開來了，而且帖木兒自身作爲舞台上活躍的一位偉大的俳優，而出現其姿態，是最惹興感，同時又是非注意不可的事實。例如說爲帖木兒的自傳的 *Tugak-i Timuri*，與其法制，或認做是其遺給子孫的傳記底 *Tuzukat-i Timuri*，即是，這些書都是用所謂察合台突厥語——察合台家領土內的突厥族的言語著述的。此外還有阿里 (*Scherefuddin Ali*) 受其孫亦不刺金 (*Ibrahim*) 的命令而著的武功記 (*Zafar nama*) 這部書，作爲帖木兒的傳記；這部書是以前述帖木兒的自傳爲底本，又是用察合台突厥語著述的。如是，帖木兒時代之時，從來專門作爲書物的用語而使用的波斯語以外，特別用突厥語著的書籍，繼續出現了，這種事實，是作爲他的民族精神的發揮，而不可不注目的。但是帖木兒自身，雖出自蒙古族的系統，可是如前所述，已經與其部屬一起，完全突厥化，在突厥文化之中成爲人的，以突厥文化，作爲自己的文化是不用說的。思慕其曩祖成吉思汗的功業，以其功業的恢復爲己任，是一般所周知的，

這兩種事實的性質，決不是矛盾的。乘其大經略的成就，企圖發揚自己所有的文化，敢然廢棄其長久的習慣——用自己也通曉的波斯語來著書底習慣，在此站在新突厥文學興隆的先頭，作爲民族精神的自覺，文化意識的發揮，確實是應該重視的事情。

帖木兒這樣的態度方針，終於使這個王朝，很能劃出察合台文學的盛時。即是他的愛子，占據也里 (Herat)，勘定帖木兒歿後的擾亂，而占領其全部領土的沙哈魯 (Shah Rukh)，除去波斯語外，還善作突厥語的詩，給其愛妃的抒情詩，現在也還殘留在也里人的傳說之中；其次，他的孫子阿合馬米兒咱 (Ahmed Mirza) 與亦思干答兒 (Iskander) 現在尙殘遺有爲人所賞讚的詩的全集；又如沙哈魯的兒子拜宋豁兒 (Baisanghur) 作爲書家，畫家，音樂家之外，還作爲詩人而出名。在這一方面特別有名的，是那位八八兒 (Baber)，他的自傳八八兒自記，(Baber-nama) 實在是作爲察合台突厥文學的精粹，而爲人所喧傳，是大家周知的事實。這些不過舉出：繼引帖木兒系統的人們的著作而特別有名的而已。他的侍者，與當時被稱爲學者的人們著作的同種的著述，今日也有很多傳述其名稱的。總之，察合台突厥的文學，更抬頭於帖木兒之時，大體通過他的王朝而追跟其發達的大勢，則非作爲顯著的事實而承認之不可。

但是發達於這一王朝的文學，固不是單單突厥的文學而已。其實當時撒馬爾罕，不花刺，木鹿，暨各方回教徒的學者文人，已經輩出，主要的是發表其阿拉伯語的著作，成爲此後回教文學隆昌之魁，是人們所周知的事實；在這一點，便非推重其在突厥王朝的文明史上殘留下來

的功績不可，是不用說的。但是作為其間的一個潮流而新造成突厥文學流行的趨勢，發揚民族意識這一點，便是非承認其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不可的理由。

在文學方面招致出盛運的這一王朝，在美術工藝方面也多所致力底事實，若果知道：首都撒馬爾罕，與不花刺，也里等市鎮，怎樣美麗地為其所裝飾，驚倒內外的時人，則容易推而知之。現在尚殘留有很多他的面影。有人說：「成吉思汗破壞，帖木兒建設」，這句話，若果從其結果上看起來，不能說不是適當的評語。

更不能脫漏的，是沙哈魯的長子兀魯伯 (Ulug Beg) 的事蹟。使撒馬爾罕成為中亞的光明底功績，不可不歸之於兀魯伯的活躍，——他代理其父沙哈魯而統治此地近四十年之間的活躍。他對於美術很有興味的結果，便在撒馬爾罕重新建設多數的宮殿，寺院，會堂，學校等等，各各都是極其輪奐之美，使那位八八兒都深歎其偉觀與優麗。突厥，阿拉伯，波斯等等文學，又繁榮於此間，也是可以知道的。但是非特別注意不可的，是其在文學上的功績之顯著。他自己就是一個優秀的天文學者，也是數學者，好從事於天體的觀察，他的好學，於其從一四二八年開始在科喜克 (Koh-i-khan) 丘上，建設有名的天文台，而表現出來，在此招致各方的學者，從事研究。(現在撒馬爾罕郊外 Chapan Ate 的丘上，尚有他的廢墟。) 結果，終於一四三七年，完成了有名的兀魯伯的天文表。據說這表是非常精確的，就以現今進步的智識，也不能超過他的精確。要之，這一代，是全帖木兒王朝文運極盛的時代，河中地方的人民，以撒馬爾罕為中

心，可以珍奇地營其平和而有光輝的生活。

然而，這樣的光景，跟着一四四八年沙哈魯的死歿而一變，又看見頻繁的內爭與外寇了。雖然如此，但是，此後尙有半世紀以上，帖木兒的後裔君臨於此處，其時，也有時回復了舊狀；但是跟着這一家的沒落，而一統永去了，文化被人所蹂躪。通觀之，則不可不說：帖木兒的出現，將中亞最重要的地方，從遊牧人的跳梁之下救出來了，完成了建設有秩序的社會而發揚突厥文化的使命。

此後，全部中亞的情形，大概講起來，是割據各方的未開化的回教徒之小君主，互爭雄長。如是帖木兒王朝時代，支配於強大的統一的君主權之下底宗教勢力，跟着君主權的輕微，反而抬頭了，大小的君主領主，各各依從仕侍於他們的回教高僧的指示，而規定其一切的行動。這樣的現象，是在未開民族分爭情態之中的時代，任何時期都會出現的情形，那些在回教的性質上，——政教兩者之間，交織着極其密接的關係底性質上，特別顯著地表現出來了。因而，依據這些高僧的指示底掠奪侵寇，名爲神聖戰爭，慘憺的虐殺，也說爲宗教承認的正當行為，如是秩序亂而安寧亡。若果成爲這樣的情形，則遠近之間曾經實行的交通杜絕了，這些地方，從世界，文明之下隔絕而孤立，不可不說是當然的歸趨。這些畢竟是阿茲柏格汗時代以後的中亞之大勢，是月即別，突厥蠻(Turkomans) 哈薩克(Kazak) 黑夏斯喀爾木克，與其他大小

部長互相鬥爭的天地。和那從其東西兩方迫集來的近世文明相接觸的時候，已經是各在清俄的勢力之下，看出其自身不自由的時期了。

